



大湾区参考

2025年第1期 总第1期

2025.08.28

- 国际涉华政治与经济动态
- 全球主要国家改革动态与分析
- AI国际政经观察
- 社会问题与改革参考
- 台海局势观察

大湾区参考

《大湾区参考》是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综合性战略资讯与决策参考月刊，以全球视野、中国情怀、湾区视角，为读者提供穿透信息噪音的深刻洞见与前瞻研判，帮助读者在复杂环境中把握趋势、识别风险、发现机遇。

本刊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术积淀与研究院专家网络，结合全频段信息监测方法，每月从海量资讯中精选最具战略价值的内容，以可信信源、数据支撑与专业解读向读者呈现。本刊关注全球大势，研判大国关系、新兴地区发展走势与涉华关键风险信号；追踪主要经济体在财政金融、产业科技与治理改革上的路径与取舍；聚焦城市化、人口结构与技术应用带来的制度议题；梳理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的技术突破、产业链重构与监管趋势，以冷静、克制的分析将复杂的全球变化转化为可视化的战略洞察。

《大湾区参考》致力于成为每一位读者洞察趋势、校准方向与提升决策质量的长期型知识伙伴，以专业洞见服务公共决策、市场主体与社会大众。

目录

国际涉华政治与经济动态（美国关税进展特辑）

中美在瑞典举行三个月内的第三轮经贸会谈，再次延长关税停战期	1
美国对欧盟征收 15% 关税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让步或削弱全球多边贸易抗衡力	5
美日达成贸易协议，日本在多个关键领域让步	10
美韩达成贸易协议，恐加速东亚优势技术与产业向美推进	13
美台达成贸易协议，台输美商品将被征收 20% 关税	17
“对等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近期开始聚焦扩大重点行业关税	20
特朗普对印度征收 50% 关税，为全球最高	25

全球主要国家改革动态与分析

《大而美法案》：特朗普的“美国保卫战”	29
特朗普政府对联邦雇员问责制的改革	40

AI 国际政经观察

中美 AI 路线：多边与“优先”的鲜明对比	49
特朗普计划向中国有偿打开 AI 大门	51
特斯拉与三星达成价值 165 亿美元的 AI 芯片代工协议	54
OpenAI 发布开源模型与中国的 DeepSeek 开展竞争	56
美国《外交政策》：精妙管控芯片，方能拴住中国 AI	58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大国竞争关键在于人才之争	60
DeepSeek 的下一个 AI 模型因尝试使用中国芯片而延迟发布	65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美国 AI 全球战略的难点不在于技术输出，而在于推动其真正落地	67
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中国 AI 3C 框架显差异优势	68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过度激进的对华 AI 芯片出口禁令恐将适得其反	70

社会问题与改革参考

“苏超”爆火下的城市治理启示	73
人际疏离：下一个社会“痛点”？	81

台海局势观察

台湾举行“汉光”军事演习	98
“台美”关税谈判进展牵动两岸局势	99
大陆对台湾实体实施出口管制	101
232 条款下“美台”半导体的博弈与台湾挑战	103

订阅方式



国际涉华政治与经济动态

美国关税进展特辑

01 中美在瑞典举行三个月内的第三轮经贸会谈，再次延长关税停战期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8日至29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及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中美经贸会谈。据悉，此次会谈涉及芯片出口管制、稀土资源出口限制、制造业政策、能源贸易政策、TikTok及技术安全问题等。

根据会谈共识，双方将继续推动已暂停的美方对等关税24%部分以及中方反制措施如期展期9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月30日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顺利进行，预计双方将达成“非常公平的”贸易协议。

专家点评：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本轮中美瑞典经贸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不仅在延长关税休战期方面取得了实质成果，还拓展了议题范围，尤其是就双方经济发展模式开展了初步但有深度的对话，为未来解决结构性分歧、推动机制性安排创造了积极条件。沿此方向，中美两国

不仅有可能解决双边的经贸问题，更有可能引领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也需高度关注一些正在影响我国谈判位势的重要趋势。尤其是美国加快与主要经济体达成经贸协议，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冲突的持续升温，正在对我方的谈判环境、议题设置与外部支持基础构成显著挤压。

具体来看，根据美方的一系列表态可以看出，如何“再平衡”中美经济关系已成为其最核心的关切。例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多次强调，希望通过谈判推动制造业回流、缩减贸易逆差。在表达上述诉求的同时，美方也频繁提及“管控分歧”和“不寻求脱钩”，释放出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希望得到中方配合，甚至实现“互利共赢”的信号。由此可见，随着中美经贸谈判步入深水区，围绕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歧已成为决定协议主要内容及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议题，并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一领域不仅是美方关注的重点，也是我方具备较强主导权的方向。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阶段，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区域协调等方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充足政策储备，因此可在精准回应美方关切的基础上，引导议题朝有利于自身发展战略的方向演进。总体上，中美经贸关系正迈入“可控竞争”与“结构调整”相互交织的新阶段，为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框架提供了重要窗口。

其次，近期特朗普政府以8月1日为节点，启动新一轮

关税施压，采取“打压强势、奖励配合、拉拢中立”的策略，显著加快与全球主要经济体达成有利于美方的贸易协议的步伐。当前谈判进展显示，此轮关税胁迫与新协议的协同推进正在系统性地重塑一个对我方愈发不利的外围经贸格局。其中在传统盟友层面，欧盟、日本、韩国等在农业、汽车、能源等关键领域对美作出实质性让步，不仅使美方得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加大对华施压力度，同时这些国家还将在新能源、船舶制造、稀土等高附加值领域向美方输出技术和产能优势，未来可能在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竞争中成为美方的助力，进而削弱与我国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印尼、越南等我周边发展中经济体因在市场开放和转口贸易监管方面积极响应美方要求，获得关税减让。这一变化使得美国得以加强对东南亚“转口贸易”路径的审查与限制，显著抬升我国通过“离岸加工+转口出口”模式进行灵活调度的成本，削弱了我国产业链的调节能力及全球制造体系中的韧性优势。面对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务实妥协立场以应对美方压力，我国在后续中美谈判与博弈中的外部支持基础正在被蚕食，并在规则制定、议题设置到政策空间等多个维度面临日益上升的压力与挑战。

最后，俄乌冲突以及伊以对抗等地区性安全局势的持续升级，虽非我方主导或可控，但已显著外溢至中美及中欧经贸议题中，成为影响我国谈判进展与成果的重要外部变量。

特朗普团队本设想通过“东西德”模式解决乌克兰问题，然而普京方面并未展现出任何妥协的意向。自7月以来，俄乌局势依然严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实施高强度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加大了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卢甘斯克州等地区的攻势，试图进一步扩大在乌东和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范围。这一系列举动不仅使欧亚地区局势持续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也引发美欧对俄措施和强硬表态的大幅升级。其中欧盟于7月18日正式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特朗普也于29日再次表示，若俄方拒绝接受停火方案，将在10天内启动全面关税措施。一方面，地缘冲突引发的安全焦虑将引发美欧对我方立场更高的敏感度与压力；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误将普京的强硬态度归因于中方支持，从而将地缘政治与经贸问题捆绑处理，将会显著提升我方在对话与博弈中的复杂性。

对此，我们展望“特朗普 2.0”时代的国际格局，可能演化出两种路径：一是类似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世界被划分为以中美为首的两大阵营，多数国家仍可能倾向美国，全球治理碎片化风险上升；二是借鉴英美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和平权力转移的模式，在斗争中保持沟通与博弈中的克制，探索边界、稳定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从近期态势看，特朗普团队仍保持一定理性与政治控制，例如未批准赖清德过境、频繁表达访华意愿等，显示其意在避免局势过度升温，维持

基本政治氛围。尤其是特朗普曾多次表态，希望中美双方不仅要达成经贸协议，更应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合作方案。在此背景下，我方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关键在于精准识别美方诉求，主动引导议题、设计议程、设置边界，推动中美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空间、共同塑造未来秩序。尤其应善用特朗普“交易型人格”的特点，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回归“求同存异、互利互惠”的谈判逻辑，通过协助其化解内政难题，换取中方在核心利益上的突破，实现双赢。

02 美国对欧盟征收 15%关税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让步或削弱全球多边贸易抗衡力

根据欧洲新闻电视台（Euronews）7月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计划对包括汽车、半导体和医药产品等欧盟出口美国的商品统一征收 15% 的关税。特朗普表示，欧盟将增加对美国 6000 亿美元的投资，并承诺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以及价值 7500 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同时，欧盟计划取消一系列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涵盖飞机及其零部件、半导体、仿制药以及部分化学品及农产品。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将为市场带来稳定性”。

然而，美欧双方尚未发布完整的协议文本，双方对部分关键细节的解读也存在不一致之处。例如，特朗普表示将对

欧盟的钢铁和铝产品维持 50% 的高关税水平，而冯德莱恩则表示该税率将会下调，并由配额制度取代。同时，美方还计划对欧盟的药品、航空航天、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出口产品开展调查评估，以向这些行业征收特定的关税。

专家点评：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这是为避免美欧贸易冲突全面升级而最终达成的一项对美方更为有利的“次优协议”。冯德莱恩表示，“15%不容低估，但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条件”。当前，欧洲主要领导人及经济界中仅有德国总理默茨对该协议表示谨慎欢迎，认为其避免了美欧分歧的扩大并保护了德国汽车等核心利益。总体上，欧洲官员对该协议普遍持批评和不满态度，认为其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例如，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表示，该协议标志着“黑暗的一天”，并补充说欧盟已经“屈服”。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表示他支持该协议“但没有任何热情”。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Bernd Lange）则强烈批评该协议严重失衡，有削弱欧盟经济实力之嫌。进一步分析来看，15%的关税安排确实将对欧盟出口带来冲击，并拖累欧盟整体的经济增长。首先，该协议使关键行业出口成本上升并将强化欧洲对美依赖。有分析指出，即便美欧双方将基准税率从之前的 27.5% 降至 15%，汽车制造商仍将面临数十

亿美元的成本增加，制药行业的成本亦将上升 130 亿至 190 亿美元。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德国、日韩等制造业国家的企业或因出口成本上升被迫在美建厂布局，从而使美国自身供应链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也加强了其他制造业国家对美的深度依赖。其次，关税将拖累欧盟经济增速并冲击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根据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汉（Andrew Kenningham）估算，15%的关税将使欧盟整体 GDP 增速下降约 0.3%，其中出口导向型的德国受影响更大，而法国、西班牙等内需主导型经济体所受冲击相对较小。最后，由于该协议实际上并未触及美欧双方最核心的结构性分歧，未来再次出现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依然较高。例如，欧盟仍未能取消美国长期关注的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税和本地化监管要求等非关税壁垒，而美国也继续保留对欧盟的医药、半导体等关键行业产品进行调查和限制，贸易工具化趋势仍在延续。

鉴于美国和欧盟是世界前两大发达经济体，双边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因此此次协议的落地将带来三个方面的全球性影响：一是欧盟的示范效应或引发各国关税协议加速向利好美方倾斜，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消极示例。作为全球关税谈判中对美强硬反制的一股中坚力量，欧盟对美国的大幅让步实质上削弱了其他国家的议价能力与谈判信心，或将导致其他未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加拿

大等) 为加快谈判进度献出更具吸引力、但也更不利于本国利益的让步条件。这一让步不仅打击了欧盟自身的谈判信誉, 相当于间接地承认了美方的单边主义立场, 也动摇了全球多边贸易合作的基础。在全球地缘格局趋向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 若实力强劲的区域性大国效仿美国单边主义的做法, 以关税威胁换取制度性让步, 全球贸易规则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对抗化风险。二是可能将推动各大经济体调整自身制造布局和供应链战略, 加速全球供应链重组, 推高贸易门槛和成本。美欧协议推动双方加大在高端制造、关键矿产、绿色技术等领域投资及合作, 加强了跨大西洋经济联系和供应链安全合作, 但也推高了发展中国家与中小经济体的边缘化风险。同时, 欧盟对美国高达 7500 亿美元的能源进口承诺也将重塑全球能源市场格局, 并加剧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和阵营化, 最终导致全球贸易成本上升、合作效率下降。三是欧盟作出的深度让步不仅削弱其自身经济稳定性, 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构成外溢风险。一方面, 在当前欧盟各国财政已高度紧张背景下, 对美投资与采购支出的增加势必挤压本土公共投资与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 欧盟本土产业在与美国深度绑定的过程中, 可能失去关键技术主导权, 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科技创新外包化等结构性风险。若欧盟长期陷入上述双重困境, 将会加剧自身区域发展不均衡、社会

不稳定等问题，并使全球经济增长的均衡性与可持续性受到实质性威胁。

根据美欧最新贸易协议的内容及其引发的欧洲内部反响，此次协议对我国既构成了现实挑战，也带来了战略机遇。就影响来看，在汽车、半导体、药品等关键领域，美国通过加强与欧盟的技术对接、投资与采购合作强化双方利益绑定，将会显著压缩我国企业在欧美市场的竞争空间，进一步加剧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趋势。尤其是欧盟此前已借助《净零工业法案》《国际采购工具（IPI）》等政策为清洁技术、医疗器械等自中国进口的技术及产品设定了更高的门槛，通过设置本土化比例要求及采购加价、排除机制收窄了中欧的合作空间。但也应看到，该协议在欧洲引发了广泛争议，不少欧洲政经界人士批评其损害本土利益。对此，我国应密切关注并主动利用这些反对声音，表明中欧合作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为欧洲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加强与德国、法国等关键国家的沟通，支持其在欧盟内部推动更务实的对华政策调整。而在推动理性政策回归的基础上，我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一是面对欧洲企业“生存压力”上升和经济自主性减弱的忧虑，中国可重点提出“稳定供应链”“扩大市场准入”“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等合作方案。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针对性的投资与技术合作机会，有助于缓解欧洲对外依赖

的单一化风险，增强其对华合作的现实意愿；二是由非敏感且互补性强的领域切入，夯实中欧双边经贸合作与技术对接的相关制度基础。我国可推动《中欧投资协定》（CAI）重启谈判进程，聚焦清洁能源、绿色制造等领域的互补性合作与政策协调机制建设，增强中欧双边经贸的战略稳定性。尤其应尝试推动中欧在绿色技术、碳市场等领域建立“规则兼容缓冲区”，以降低技术标准与合规体系差异所带来的壁垒风险；三是以中资企业本地化发展为抓手，持续增强中欧合作深度和韧性。尤其是把握欧洲对高质量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政策导向，通过设立本地工厂、并购中小企业、共建研发平台等方式，提升中国企业在欧市场的“嵌入度”。本地化不仅有助于规避贸易壁垒，更能够增强中资企业在欧盟市场的政策适应力与公众认同感，打造更具韧性的中欧合作网络。

03 美日达成贸易协议，日本在多个关键领域让步

据《联合早报》与路透社7月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日两国已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这是继英国、印尼和越南之后，美国在其设定的8月1日关税生效期限前完成的又一项关键双边安排。根据协议，美方将原定对日本出口商品实施的25%关税降至15%，并承诺在半导体与药品领域给予“最惠待遇”，即未来若美方对第三国适用更低税率，日本将自动享有相同待遇。

作为交换，日本将在多个关键领域作出实质性让步：一是日本首次承认美国产汽车技术标准，并同意放宽对美产汽车的进口限制。二是在农业方面承诺将美国产大米进口配额提高至 75%，并新增采购总额约 80 亿美元的玉米、大豆、生物燃料等产品。三是向美国的半导体、能源、关键矿产、医疗和造船等领域提供总计约 5500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对此，尽管美方宣称将获得高达 90% 的利润分配权，但日方强调利润分配应遵循出资比例与风险共担原则。目前，双方尚未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投资协议文本。

专家点评：此次美日贸易协议的达成，既是日本在其内政动荡与对美结构性依赖下的被动妥协，也是特朗普政府“关税胁迫”战略的又一关键成果，这反映出美国正通过强硬的单边手段进一步重塑与传统盟友的利益分配格局，迫使其在更大程度上配合“美国优先”原则主导下的地缘经济战略。在多轮谈判陷入僵局后，日本对美谈判最终让步，反映出其对外政策空间在国内政治不确定性下遭到显著压缩。协议出台正值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历史性失利，石破内阁在失去议会主导权、党内支持动摇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向美方妥协稳住双边关系，缓释经济下行、通胀压力及市场信心动荡所引发的连锁风险。然而，这种“退让妥协”策略却进一步加剧国内不满，引发农业、制造业等关键产业的焦虑，

也进一步削弱日本政治稳定性。

从协议内容来看，尽管美方象征性下调惩罚性关税（从25%降至15%），短期内缓解了日本汽车等行业的出口压力，但中长期来看，日本可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对美依赖加深和经济增长乏力等严峻挑战。例如，日本承诺对美高达5500亿美元的投资，或将削弱其国内产业投入，进而在长期内损害整体产业竞争力。而15%的关税以及未来潜在的关税胁迫，将迫使日本汽车等关键产业通过降价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本土，从而导致日本部分产业空心化，并进一步加深对美经济依赖。根据野村研究的分析，该协议将使日本实际GDP下降约0.55%，并将2026年底前日本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推高至50%。更为重要的是，美日此类“赴美投资+资源采购+开放市场”的协议模式，已在美韩、美欧谈判中表现出趋同性，正逐步成为美国重塑贸易规则与产业链布局的典型“要价”模式。

对中国而言，既需警惕在半导体、电动车、关键原材料等链条上形成的“美日联动”对我产业升级以及国际外循环产生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正面临“安全依美+经济自救”的结构性分裂现实及其对中日经济合作的机遇。一方面，日本需通过加强对华合作来缓冲对美贸易再平衡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其在区域规则重塑中的被动角色，也为中国推动中日韩自贸区、构建中日地方产业协作机制、深

化绿色低碳技术规则合作等提供突破窗口。对此，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主动布局：一是前瞻性评估日本在美主导下对外投资策略的调整趋势，特别是在半导体、电动汽车、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的投资转移和产能再配置，在国际竞争层面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压力；二是利用日本国内对美的不满情绪以及对经济自主发展的焦虑，塑造“中国是稳定开放的经贸合作伙伴”的叙事，推动其内部对华政策更加务实和理性化；三是可围绕区域技术标准、金融互通、产业链安全等重点议题，以“经济工具为矛、制度安排为盾”稳住中日产业互嵌关系，并通过多边机制分化美日之间的结构捆绑效应。

04 美韩达成贸易协议，恐加速东亚优势技术与产业向美推进

综合路透社与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月30日宣布与韩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将原定8月1日对韩国商品征收的25%关税下调至15%，并承诺韩国在半导体与药品领域享有“最惠待遇”。同日，韩国总统李在明(Lee Jae-myung)表示该协议“消除了出口不确定性”，并宣布将在两周内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举行首次正式会晤。此前，韩美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主要分歧在于韩国最初不愿接受美方提出的4000亿美元投资要求以及进一步开放稻米与牛肉市场。随着美日此前于7月22日达成贸易协定，韩方最终提高承诺金额，

推动协议在最后关头敲定。

根据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提供总额 3500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其中，1500 亿美元用于由 HD 现代集团与韩华集团牵头的“MASGA”(Make American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将在美国建设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中型集装箱船及军用舰艇等生产设施，融资由韩国国有银行及保险机构提供贷款和担保支持。其余 2000 亿美元将用于投资美国的半导体、电池、核能与生物技术等产业。美方宣称将保留 90% 的投资利润，韩方则强调，相关收益将优先用于美国本地再投资，但具体分配机制尚待磋商。在能源与采购方面，韩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半内采购总额 1000 亿美元的美国产能源，包括 LNG、液化石油气(LPG)、原油及少量煤炭，并扩大对美工业制成品、防务装备和部分农产品的采购。然而，尽管面对美方持续施压，韩方在国内压力下再次拒绝进一步开放稻米与牛肉市场，仅同意在食品安全与监管标准方面与美方展开技术性沟通。协议达成前，韩国总统秘书禹尚浩曾公开表示，韩方正努力“在农产品议题上减少让步”，以缓冲国内相关产业所承受的冲击。

专家点评：此次美韩贸易协议的迅速落地，是在美方高压谈判模式与日方率先妥协之后，韩国所做出的策略性响应，也凸显出美国通过“关税倒计时”机制加速推动对盟友利益

再分配、以服务“美国制造”战略的意图。一方面，从时间节点上看，协议在美日达成类似安排仅一周后敲定，显示出韩国急于避免成为“孤岛国家”而被迫提升让利幅度，特别是在对美投资额度和能源采购安排上迅速妥协，主动提出与美合作造船计划，反映出其在面对美国强硬政策下回旋空间持续压缩的趋势。另一方面，美方在对韩谈判中延续了其对日模式，借下调关税与制度优惠换取大额投资承诺与战略绑定。协议背后，实质上是美方将韩国嵌入其重塑军工、能源与技术链条的布局体系，尤其是 MASGA 计划反映出美方对本土军工与基础制造能力重建的长期布局。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日韩先后与美达成高强度双边协议，一个由美国主导、覆盖技术、能源、制造与农业的“美日韩经贸战略三角架构”正在形成。这一架构的核心不仅在于经贸往来，更在于通过关税杠杆、投资绑定与制度绑定三位一体的机制，构建起以美为中心的资本分配与规则设定体系。通过“最惠待遇”、投资利润回流、标准外溢条款等制度安排，美国不仅强化了对区域高端产业链、供应链与规则链的核心主导力，也为其推进印太供应链重组打下制度基础，使其在“小院高墙”下的产业脱钩与盟友绑定战略拥有先发优势。美方在对日韩的协议中植入“最惠待遇”、高比例利润分享及战略投资绑定等条款，实质上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议程主导权，进一步强化了美日韩三边在经

济、规则与资本流动层面的政策协同。未来若进一步固化，则可能对东亚现有经贸秩序、标准主导权与多边合作路径构成深远影响。

然而，尽管美日与美韩协议在形式、时间节点以及核心条款设计上呈现出高度趋同，但两者背后所依托的政治动因、结构设计和本土产业保护方面却展现出关键差异：首先，从协议达成的驱动逻辑看，日本更多是在政局动荡与对美结构性依赖下的主动让步，希望借对美快速妥协换取内部政治与经济局势的短期稳定。而韩国则是在“日美已签”与“关税倒计时”双重压力下，被动抬高投资承诺以防“落单”。其次，在协议结构与嵌入方式上，日本协议突出技术标准互认、农业市场放开与模糊性战略投资等，而韩国则更偏向“项目绑定+能源锁定”，其协议核心是具象化的产业投资计划与能源采购安排，尤其 MASGA 军工投资项目使其深度卷入美国制造业回流工程。最后，在国内产业保护方面，韩国保住了稻米与牛肉市场准入等议题底线，日本则因选后政治弱势，放弃了更多产业谈判空间。

韩国承诺在自身产业优势领域加强对美投资和本土化生产能力，这一策略虽有助于规避美国强化的贸易保护措施，但也可能加速韩国优势产业部分生产环节向美转移，进而对中国在相关高端制造与区域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合作网络构成潜在冲击。对此，我一方面需高度警惕韩国在高端制造领

域的赴美动向。韩国若同日本一起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制造业回流与技术封锁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中美间的全球产业竞争。因此，需加强对关键产业如新能源、船舶制造、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等赴美生产动态监测与战略研判，防范美日韩三边联动对中国优势领域构成系统性挤压。另一方面，也应审时度势，借势推动中日韩区域经济体系的重构与深化。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等外部冲击，中日韩三国在维护区域产业链稳定、抵御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当前韩国政局相对稳定，政策制定空间较为宽裕，为中韩之间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有利窗口。在此背景下，我方应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强化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技术标准等新兴领域的协同共建，打造更具韧性与互补性的区域经济体系。

05 美台达成贸易协议，台输美商品将被征收 20% 关税

据路透社 8 月 1 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与台湾达成初步贸易协议，美方将对台湾输美商品课征 20% 的“对等关税”。尽管该税率低于此前传闻的 32%，但仍高于台湾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韩国的 15%，在台湾引发广泛争议。

当天上午，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与其副手萧美琴及多位高层召开记者会，强调该税率为谈判团队努力下取得的

“暂时性成果”，未来仍有调整空间。赖清德指出，关税最终幅度将取决于美方依据 1962 年《贸易扩张法》第 232 条款所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涵盖半导体、电子与信息通信技术（ICT）等关键产业。调查结束后，双方将就具体税率展开新一轮磋商。

针对在野党批评谈判过程“黑箱作业”，赖回应称，台湾必须遵守国际谈判规范，并受限于与美方签署的保密协议，但承诺协议完成后将向立法院全面说明。投资机构普遍分析认为，目前公布的关税仅影响台湾对美出口约四分之一，应视为后续高科技产业关税谈判的“前哨战”。

专家点评：美台达成的 20% “对等关税” 协议，表面上是赖清德政府的一次“止损式谈判”，但实质上是特朗普政府精心设计的战略动作，体现其一贯的“极限施压”与“交易型外交”风格。美方先通过释放 32% 惩罚性关税的高压信号制造市场恐慌，再以 20% 的结果营造“让步”假象，实际上是在凭空设定谈判筹码，实现实质利益攫取。此外，美国对台湾课以高于日韩的税率，是在美日韩台芯片联盟中实施“分而治之”，意图削弱台湾的自主议价能力，并在内部制造不公平感与裂痕。当前的关税主要适用于传统商品，真正的目标是后续“232 条款”调查所针对的半导体与高科技领域，这无异于将谈判高压基调锁定在台湾最具价值的产业核

心，为掠夺其技术与产能提前布局。

特朗普的战略性施压及美台贸易关系的走向将对中国大陆构成以下挑战：首先，借由关税压力与补贴引诱，美国正推动台资企业“去台化”与“去陆化”，叠加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不当的经济政策，导致台资金、技术与人才流向美国，这不仅将重创台湾地区的经济，而且也会削弱两岸经济循环与联系；其次，从区域发展与稳定的角度看，特朗普当局近期达成的一系列关税协议与未来潜在的行业关税，均在加速高端制造业及产能转移至美国本土，其中也包括如台积电、鸿海等台资龙头以及亚洲地区最为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这在中长期将扰乱我国在区域层面运转良好的制造业分工体系，或将加剧中美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直接竞争；更重要的是，经贸联系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根基正被逐步侵蚀。台湾在经济上日益依附美国，政治上更趋激进，这将显著增加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在此背景下，大陆需采取多维度应对策略。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岛内政治对立，支持在野力量揭露民进党当局“丧事喜办”及其“逢美必软”的政策后果，强化岛内民众对所谓“亲美换安全”的质疑。另一方面，在经济层面，要加大对受关税冲击台企的吸引力度，提供政策便利和转型空间，推动其内迁或本地化转型，减缓“脱陆”趋势。

06 “对等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近期开始聚焦扩大重点行业关税

近期，美国政府将其关税政策重心由针对特定经济体的“对等关税”，转向钢铁、铝、半导体及药品等特定行业关税的趋势已开始显现。具体而言，在钢铁与铝方面，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将扩大此前针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50%关税的范围，将数百种衍生产品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美国商务部随后发布公告称，工业与安全局已将407个产品编码加入《美国协调关税表》，这些产品因含钢铁和铝成分将被加征额外关税，扩大后的关税清单将于8月18日正式生效。

在半导体与芯片领域，特朗普于8月6日表示，将对进口半导体征收约100%的关税，但已经或计划在美国生产的企业可获豁免。8月15日，特朗普在公开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将在未来两周内对进口芯片和半导体征收关税，一开始税率会较低，但未来可能大幅上调至200%甚至300%。据悉，该项关税政策将“不适用于在美国建厂”的企业。针对此，韩国产业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Yeo Hankoo）8月7日表示，依据美韩贸易安排，三星电子集团与SK海力士集团应不受关税影响，但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官方回应。台湾地区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金庆指出，台积电因在美已有投资和生 产布局，预计受冲击有限。与此同时，苹果公司宣布将在美

追加 1000 亿美元投资，重塑其供应链芯片制造体系，以争取成为获豁免的企业之一。

在进口药品方面，8 月 5 日，特朗普表示将先对进口药品征收“小额关税”，并在一年至一年半内逐步提高至 150%，最终甚至可能上调至 250%，以推动制药企业将生产迁回美国。8 月初，特朗普向礼来、诺和诺德、辉瑞等 17 家全球性制药公司发函，要求其在 60 天内将美国新药价格降至其他特定国家的最低水平，从而对医药企业施加直接的价格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于 4 月 1 日依据《贸易扩展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启动针对半导体及制造设备、药品及相关原料的国家安全调查，但调查结果尚未公布。多位官员和业内人士预计，正式公告及关税实施可能还需数周时间。同时，这几类产品此前已部分纳入美欧、美日及美韩关税安排。根据美欧框架协议，药品与半导体关税目前为零，但调查后若上调，上限为 15%；而美日、美韩协议则确认，美国不会对日本和韩国征收高于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和药品关税。

专家点评：在“对等关税”政策自 8 月起得到逐步落实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近期转向对钢铁、半导体、医药等关键行业施加高额行业关税，可能出于以下考量：

“对等关税”虽以缩减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为名，但其核心作用更像是一种施压工具。从近期达成的协议来看，

这类关税一方面通过一定幅度的税率增加了美国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迫使相关国家扩大对美投资与采购。然而，出于防止通胀失控等原因，当前的关税税率普遍不高且豁免范围较广，其对制造业回流的实际推动作用较为有限。相比之下，行业关税的针对性和冲击力则更为突出。当前政策重点落在钢铁、半导体、药品等高附加值和高端制造领域，税率水平明显高于“对等关税”，并直击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如果持续实施，这类关税可能会深度影响并重塑跨国企业的生产布局，加速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地化重组，并对全球制造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行业关税与“对等关税”作为相互配合的手段，不仅强化了美国在对外经贸谈判中的杠杆效应，使其能够从盟友与竞争对手处榨取更多投资、市场和财政利益，还可能真正迫使重点行业的企业实质化地调整其生产布局。以钢铁和铝为例，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约52%的钢铁进口依赖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韩国和德国，其中来自加拿大的铝进口占比高达53.3%。这意味着关税政策直接向盟友施压，不仅可能迫使加拿大、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的重新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也将倒逼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强国的企业加快向美转移。

对我而言，美国的行业关税政策将对我国各关键产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首先，钢铁与铝是首批被纳入加征范围的

重点领域，但其对我国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由于中国早在2018年起就已受到美国232条款关税限制，直接出口份额不断缩减，2023年中国对美钢材出口量不足美国进口总量的3%，铝材出口占比也有限。因此，本轮关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间接压力上：一旦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主要出口国被压缩市场份额，其部分钢铝产品可能转向亚洲，加剧区域内竞争。相比之下，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最为突出，将对中国企业带来双重压力：一是上述政策将迫使全球芯片巨头加快在美布局，并深度嵌入美国科技产业。近期，三星与特斯拉达成165亿美元AI芯片供货及德州新厂投资协议，即为对此政策的直接响应。这意味着全球领先企业在技术、市场和供应链上的优势正逐步向美国集中，而中国企业若无法在美设厂或建立深度合作，可能在技术追赶和关键订单上被边缘化。二是中国作为全球封测和中低端芯片的重要基地，短期内可能面临企业成本与竞争压力骤增、订单外流及价值链被弱化的风险，同时在AI大规模部署及高端计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算力支撑受到制约，将持续影响我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应用进程。而在药品行业，短期内中国原料药和仿制药出口面临较大冲击。美国约80%的抗生素依赖中国供应，药品行业关税将会显著推升青霉素等基础药物的出口成本。但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原料药高度依赖难以替代——例如，其市场95%的布洛芬、70%的对乙酰氨基酚均来

自中国。过高的关税不仅会推高美国药价，还可能导致供应短缺，迫使政策回调。

在美国行业关税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统筹应对潜在的系统性冲击，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建立跨部门的产业风险预警与应急协调机制，要密切跟踪行业关税的进展，特别是对重点企业的投资布局 and 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影响，并据此动态评估对中国产业竞争格局的冲击，提前储备好关键原料及零部件，并为企业提供法律、金融与市场开拓等多维度支持的应对预案。尤其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政策不仅涉及高端制造和核心技术，还可能与台海问题交织，对我国科技、产业等方面的安全带来复杂挑战。

其次，应重点关注受行业关税政策波及的主要国家（如韩国、日本、欧盟成员国等）的政策动向，观察行业关税会否削弱或改变此前“对等关税”框架下的安排，并评估这些国家在对美政策中的立场调整。相较对等关税，行业关税更强调“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中国应在此背景下寻找潜在合作点，积极推进海外多元化布局，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分散市场集中度，降低美国市场壁垒带来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国应立足自身，通过加快研发投入、强化政策支持 and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外部波动的冲击。尤其是针对半导体设备、核心材料及药物原料等短板环节，加大研发

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形成“补链、强链、固链”的合力，以减少对外依赖和被动风险。

07 特朗普对印度征收 50% 关税，为全球最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月 4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印度购买大量俄罗斯石油并借此获利，美国将大幅提高对印度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紧接着在 8 月 6 日，特朗普便签署行政令，对印度输美产品征收额外的 25% 关税。结合美国此前计划自 8 月 7 日起对印度征收的首轮 25% “对等关税”，特朗普政府对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进口商品的总关税将高达 50%，成为美国对外征收的最高税率之一。

自美国宣布加征更高关税后，印度社会抵制美国产品的呼声高涨，部分地区已出现抗议和示威，印度政府也正在评估反制措施，包括对美国产品提高关税或限制部分进口等。与此同时，印度总理莫迪于 8 月 15 日在新德里发表的独立日演讲中强调，印度将保护农民、渔民及其他劳动者的利益，抵制任何有害政策，“绝不会在他们的利益问题上妥协”。

目前美印双方尚未就新一轮关税达成贸易和解，据悉美国谈判代表将于 8 月 25 日前往印度，重启贸易谈判。而与俄罗斯相关的制裁性关税预计将于 8 月 27 日生效。

专家点评：从动机上来看，美国对印度加征 50% 关税，既有经贸考量，也有地缘政治因素。其中在经贸层面，印度长期保持较高的关税水平，并对美存在较大贸易顺差，这使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的重点施压对象。尽管美印双方进行了多轮贸易谈判，印度也曾提出取消部分工业品关税，并承诺增加国防和能源领域的采购以示妥协，但却在农产品和乳制品关税问题上始终拒绝让步。其原因在于这两个领域涉及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关系到数以亿计、以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农民就业和生计。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祭出 50% 的超高关税，既能增加自身在农产品和乳制品谈判中的筹码，亦有“杀鸡儆猴”之意，借针对印度向其他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贸易伙伴施加威慑。

而在地缘政治层面，一方面，特朗普曾承诺尽快推动俄乌冲突解决，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近期美方试图通过限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来迫使俄方妥协，印度因贸易谈判进展不畅及对俄持支持立场，成为美国落实这一举措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美印双方在今年 5 月印巴冲突的停火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特朗普多次宣称自己在促成停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印度则坚决否认这一说法，并强调在冲突期间莫迪与特朗普并未进行直接通话。

影响来看，这一举措将对印度产生极大冲击。全球贸易研究倡议组织（GTRI）创始人阿贾伊·斯里瓦斯塔瓦（Ajay

Srivastava)指出,50%的关税几乎等同于对两国贸易实施“禁运”。其强调高关税可能使印度损失约500亿美元,而通过向欧洲、东盟、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新市场多元化发展,在1-2年内最多也只能弥补100至150亿美元的损失。印度券商Elara Securities的经济学家加里玛·卡普尔(Garima Kapoor)则直言:“面对50%关税,印度任何产品都无法具备竞争优势”。这种冲击尤其集中在低利润、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宝石和珠宝、纺织品及海产品等。业界人士透露,部分美国买家已暂停新订单,甚至要求将生产转移至越南、孟加拉等关税较低的国家,这可能影响印度数十万就业岗位。

从近期表态看,印度政府仍不愿屈从于美国压力。分析认为,这既源于其与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纽带,也出于对‘独立自主’形象的维护。俄罗斯不仅是印度武器和能源的重要来源,其低价石油也为印度带来实利。若莫迪政府在美方施压下退缩,不仅会损及对俄关系和实际经济利益,也可能在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氛围中被视为软弱。此外,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拥有较大市场潜力,也让莫迪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有底气与美国“硬磕”。面对高关税冲击,印度目前主要采取了三方面举措:一是继续与美国交涉。既保留谈判和妥协的空间,也不排除采取关税报复等强硬手段;二是强化内循环。莫迪已承诺加大对农户、渔民和畜牧业的支持,并于今年10月起下调商品和服务税(GST),以刺激国内消费,

部分抵消外需下滑的影响；三是加快外部市场多元化布局，获得更多战略回旋空间。其中既包括加强与英国和欧盟的经贸合作，也在试图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如莫迪计划在本月底出席在中国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也是其七年来首次访华。

面对印度在美方压力下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我国可予以积极回应，但关键在于观察其实质行动和政策落实。总体上，我国应坚持互利共赢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战略耐心，不应因美印摩擦而急于拉拢，更不能放松对美印重归于好、美继续借印遏华的警惕。与此同时，我国应在上合组织、金砖机制和 RCEP 等平台上加快制度建设，将中印合作放入更加广阔的多边框架。例如，通过在金砖推动两国在本币结算、供应链合作和科技创新等议题上的合作，将印度对美政策的临时转向转化为长期的“规则约束”和“利益绑定”。

全球主要国家改革动态与分析

01 《大而美法案》：特朗普的“美国保卫战”

2025年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引发全球震动的《大而美法案》（OBBB）。这一法案以大规模减税为核心，同时伴随削减福利、重塑财政格局，被普遍视为“逆向再分配”的典型案列。法案甫一颁布，便在美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批评其倒退、加剧贫富分化；有人怀疑其战略意图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人认为它代表着美国制度道路的“再革命”。

然而，如果仅仅把“大而美”法案视为一份财政政策文本，未免流于表面。其背后所隐藏的议程，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言，乃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理解的“美国保卫战”。这一“保卫战”不仅关乎美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分配与政治撕裂，更关乎美国在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视野中如何定义自我、如何应对全球秩序的变迁。本文将尝试从法案内容、政治本质、内外牺牲与挑战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并浅谈对中国的启示。

一、“大而美”法案的政治本质：“美国保卫战”

总体来看，该法案既是一份财政重构方案，也是一场政治动员工程。表面上，它以大规模减税为主要抓手，同时辅之以削减福利、压缩公共支出；但深层次看，其目标早已超

越了经济范畴，而是寄托着特朗普阵营对于“美国何以为美国”的焦虑与回答。

（一）经济层面的“减税+削福利”组合拳

法案将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多数条款永久化，未来十年减税规模高达 4.5 万亿美元，其中企业与高收入群体获益最大。与此同时，约 1.7 万亿美元的财政缺口将通过削减底层民众依赖的福利项目填补：包括对医疗补助（Medicaid）和食品援助（SNAP）实施新的工作门槛、设立联合支付机制、推动各州分担 SNAP 误差成本等，预计将有 1180 万人失去医保，另有 300 万人失去食品援助。法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制度性支持空间被显著压缩，但对高净值人群和资本收入减税条款却得以延续乃至扩大。据耶鲁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未来十年，美国收入最低 20% 人群的年均税后收入将下降 2.9%，而最富裕 20% 人群将上升 2.2%，贫富分化在税制层面被制度性固化。再者，大学捐赠基金课税上调、汇款附加税、清洁能源补贴取消等条款，都将影响教育、环保与移民群体的可获得性与权利保障。

因此从经济角度看，这个法案无疑是倒退的，甚至是落后的和反动的。其以牺牲基础公平为代价强化“选民经济”，重塑美国社会分配格局，是对“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型的系统拆解。一些批评者更是“无中生有”地认为，这部法案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而是“让中国再次

伟大”。

（二）政治和社会角度的“美国保卫战”

如果仅仅把“大而美”理解为经济政策，显然是不够的。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这部法案承载着更深层的意涵：它是一场“美国保卫战”。问题在于：他们究竟要“保卫”怎样的美国？

自 17 世纪清教徒登陆新大陆以来，美国的文化认同长期建立在以英语、基督教信仰、个人主义伦理和有限政府传统为核心的盎格鲁—新教价值体系之上。20 世纪以前，移民虽不断进入美国，但总体规模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认同结构。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民权运动、移民潮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才逐渐打破了这一“单一认同”。进入 21 世纪，美国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族裔、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叠加在经济分化之上，使得“传统美国”在越来越多的白人群体眼中，仿佛正在被稀释乃至消失。

特朗普的 MAGA 运动，正是这一焦虑的政治化表达。对他的支持者而言，他们所“保卫”的美国，并不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而是那个以白人盎格鲁—新教价值为主体的“传统美国”。这也是为什么“大而美”法案不仅仅是财政操作，而是一次制度性的“守旧”尝试：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逆转社会认同的碎片化，重建一个由特定文化价值主导的国家认同。

这种逻辑与亨廷顿的理论不谋而合。在《文明的冲突》与《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曾明确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重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内部认同的瓦解。随着种族、宗教与语言的多元化，美国赖以维系的凝聚力逐渐崩解，只剩意识形态在支撑。然而，历史表明，仅凭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脆弱的，一旦社会共同体缺乏文化与价值的共识，其命运往往难逃斯巴达与罗马的覆辙。亨廷顿的警告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那里被转化为一种政治动员：既然“传统美国”正在消逝，那么必须通过制度性手段加以挽回。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而美法案》不仅是一次财政重构，更是一场文化反击战。它试图以减税和削减福利的方式，重新划定“值得保护的美国人”与“不值得保护的美国人”的界限，从而在经济层面的得失中，重建文化与认同的边界。换言之，这不仅是一部法案，而是特朗普式“美国保卫战”的制度体现。

二、法案在国内外层面隐含的“牺牲”

尽管特朗普自认为其有“神助”，但他还没有把自己视为神。要重振美国，他需要依靠力量。重振的过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有牺牲者，也有获得者，牺牲者的反面即是获得者。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无论是牺牲者还是获得者，都表现得清清楚楚。

概括地说，“大而美”法案隐含着美国内部的三个相关

的“牺牲”和外部的三个相关的“牺牲”。

（一）美国内部的三个“牺牲”

在内部，第一个最大的“牺牲”便是美国的“社会底层”。正如前面所论及的，这一点人们都看到了。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特朗普并非要牺牲整个社会底层，因为他宣称他要代表美国大多数劳工阶层的利益。在“大而美”法案里，他要牺牲的是依靠福利而生存和生活的社会底层。特朗普反对欧洲式的福利主义。如同新教理论，特朗普相信人们所获得的应当是人们努力的结果，而非天生的“权利”，更不是不劳而获。因此，在削减福利的同时，特朗普也免去了“小费税”，鼓励底层人群通过工作而有所获。这一思路和传统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强调资本的作用，强调“一次分配”而非政府的“二次分配”在增进全社会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个“牺牲”是美国的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说，“大而美”法案是对民主党的所有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反动。这不仅表明了今天美国政党政治的撕裂程度，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何谓美国？”的完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牺牲”是极端或者激进力量。极端的“左派”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尤其是大学。特朗普对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一直充满敌视，认为这些大学并没有培养出美国所需要的人才，而是充斥着 LGPTQ 文化、“觉醒”文化和 DEI

文化，从而培养了反美国的“人才”。特朗普的这种反对充分表现在“大而美”法案系统性削减联邦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向精英阶层倾斜的趋向性。据 New America 估算，法案对教育整体削减额度达 3500 亿美元，其中 3000 亿集中于高教与贷款系统。这一财政重构通过如下机制推进：一是对佩尔联邦助学金（Pell Grant）项目附加严苛的修课要求，显著提高获取门槛；二是取消联邦研究生贷款（Grad PLUS）和家长贷款（Parent PLUS），设定研究生贷款上限（硕士 10 万美元、博士 20 万美元），大幅削弱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少数族裔获取高等教育的能力。穆迪预测，美国最古老并且规模最大的非裔高等健康科学高等学府梅哈利医学院（Meharry Medical School）将因本土生贷款额度受限与国际生拒签率高达 42% 的双重冲击，陷入高达 3700 万美元的年度赤字，这显示出高教财政高度依赖政策设计的系统风险。

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法案的推出是一场以财政与问责为手段、以意识形态重塑为目标的政治清算。或者说，特朗普想用他认为的“美国的意识形态”来替代他认为的“非美国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政府在教育领域推行的政策体系——从削减拨款、问责绩效，到打击国际生与特定高校——构成一场有组织、有目标的“去精英化”行动。此前特朗普政府通过将联邦资助与高校政治倾向挂钩，以“反犹”“亲巴抗议”为由，冻结常春藤高校拨款，要求其提交学生社团记

录与课程审查材料，甚至签署“忠诚声明”。这些本质上是以国家安全名义推进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治理，打击自由派主导的学术机构与优绩主义网络。教育部权威被削弱，多元、平等、包容议程遭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大学从知识与批判的空间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延伸。法案通过财政杠杆和绩效问责掩盖其政治本质，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制度性调整重塑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让大学不再是多元与批判的空间，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二）国际层面的三个“牺牲”

在国际层面，**第一个“牺牲”便是盟友**。这很容易理解。特朗普认为，美国的盟友高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愿意出钱支持美国，这造成美国内部发展和外部霸权的不可持续性。尽管传统上美国精英认为，基于美国盟友体系之上的“自由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但特朗普对此并不感兴趣。无论在国际安全层面还是在国际经济层面，特朗普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同盟政策。这使得整个西方感到绝望，认为特朗普导致了“自由国际秩序”的解体。

与盟友体系解体相关，第二个“牺牲”是国际秩序。从其第一任期到今天第二任期，特朗普已经从联合国各个功能部门（例如教科文组织）和诸多国际条约（例如巴黎气候协议）“退出”，同时也把被视为是国际经济秩序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搁置一边。尽管美国在二战之后在确立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秩序方面扮演了主导角色，但特朗普认为，这一秩序多年来已经演变成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三个相关的“牺牲”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无论是特朗普的大规模反移民政策还是其“再工业化”政策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政策有助于美国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辅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留学生人才，尽管很多人学成之后留在美国为美国做贡献，但也有很多学生返回了他们的母国，推动了母国的经济发展。特朗普的教育政策不仅对少数族群不利，更不利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同样，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这些国家的“去工业化”。二战以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了欧洲的复兴，也帮助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实现工业化。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是在继续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而美国往往是这些国家的最重要出口国。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政策无疑决定了美国不再是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助推力量，而是阻碍力量。

简单地说，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想回答一系列相关的大问题：谁是美国？谁是美国的统治者？美国向何处去？

三、“大而美”构想所面临的挑战、不确定性与对我启示

（一）四方面挑战与不确定性

尽管《大而美法案》自推出以来饱受批评，既有来自美国国内左派的反对，也有整个西方世界的质疑与妖魔化，但从民主党内部的混乱与衰弱来看，该法案依然拥有相当的政治支持。由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合法性或合理性是否充分，而在于它能否真正落地，并实现特朗普所设想的“大而美”蓝图。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法案及其背后的政治战略面临至少四方面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美国碎片化的政治。在所有国家，政治决定一切。美国政治的碎片化不仅仅表现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党政，更表现在两党内部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民主党内部是碎片化的，共和党内部也是碎片化的。最近亿万富翁马斯克因为和特朗普闹不和成立了新的政党，“爱泼斯坦文件”也导致着特朗普和 MAGA 运动的分裂。政治的碎片化表明这些力量都可以随时分化和整合。尽管在制度层面，正如很多观察家所已经指出的，现在的美国趋向于“三权合一”，而非传统上的三权互相制衡，特朗普似乎掌控了大权，但政治碎片化并非是特朗普所掌控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民粹政治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易变性。特朗普通过民粹政治而掌权，但如果掌控不好，他也是可以被民粹政治所冲垮的。

其次，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并非特朗普所掌控。特朗普想在最大限度上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创造财富，在这个基

础之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和培植美国的“白人中产社会”。然而，美国当下诸多社会矛盾本身正是资本过度扩张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赋权资本或许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不平等与社会撕裂。《经济学人》就曾直言，不应指望这份法案能带来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换言之，特朗普选择的路径很可能把美国带入“治本无方、治标无力”的困境。

再者是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互联网（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的消失，而且在促成财富掌控在社会极少数个人手中，即那些“巨头”手中。尽管特朗普“大而美”法案希望能够再次做大白人中产，但当代技术的发展对白人中产同样不友好。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角色的变化。特朗普想通过对资本的“去监管”和对地方政府的“分权”去构造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这是1980年代里根革命的理想，也是现在特朗普改革的理想。但问题在于，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里根革命1.0版”的产物，作为“里根革命2.0版”的特朗普革命可以解决“里根革命1.0版”所产生的问题吗？无论是里根革命1.0版还是里根革命2.0版，都没有触及美国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而是强化了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如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其问题在于上层

建筑和生产关系。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关系都是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是政府。想通过削弱政府的力量来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我国的启示

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及其背后的“美国保卫战”，揭示了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冲击下的制度性焦虑。它的逻辑是通过牺牲边缘群体与国际公共品，换取核心群体的安全感与认同感。其对我可能存在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增强制度自信与传统文化认同。美国的困境说明，若一个国家的认同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则极为脆弱。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时，必须兼顾文化传统与多元融合，避免单一认同崩塌。

二是强化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美国“逆向再分配”的代价是社会撕裂。中国需在发展中更加重视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防止两极分化固化。与此同时，针对上述技术影响引发的不确定性，我国在推进 AI 和数字经济时，必须同步设计就业转型与社会保障体系，避免“技术性失业”衍生社会动荡。

三是抓住全球秩序重塑的战略机遇。在美国不得不主动削弱全球公共品供给、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全球治理机制积极填补空缺，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与制度影响力。

02 特朗普政府对联邦雇员问责制的改革

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为主要政治口号，强调要削弱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影响力。所谓深层政府，指的是那些虽未经选举产生，但长期在联邦官僚体系中掌握实权的群体。这些人依靠制度保障和职位优势，往往能对政策制定和执行施加实质性影响。特朗普认为，这一体系已经成为限制总统权力、阻碍政策推行的最大障碍。他在竞选中反复强调，必须打破这种僵化的官僚结构，才能真正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在这一逻辑下，改革联邦雇员问责机制便被视为重塑权力格局的重要手段。

一、改革的举措、进展以及社会担忧

（一）改革举措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在就职当天即签署了第 14171 号行政命令，题为《恢复联邦政府部门中政策制定职位的问责机制》（Restoring Accountability to Policy-Influencing Positions within the Federal Workforce）。该命令的核心目标，是将部分联邦雇员从原本受到正当程序保护的“职业雇佣”状态，转变为“自由雇佣”状态（at-will positions）。这意味着，政府将能够更快速、更直接地解雇那些不服从总统指令，但在政策制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官员。在特朗普看来，这一机制不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还能让总统的政策意志得到

更加彻底的贯彻。通过削弱官僚体系固有的独立性，他试图重塑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

白宫在 4 月 18 日发布的情况概要书（Fact Sheet）对改革的动因进行了详细说明。文件指出，当前的联邦雇员制度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解雇程序冗长复杂，导致问责成本过高，使得部分雇员即便表现不佳也难以被淘汰；二是部分雇员利用制度保护，公开抵制总统政策，甚至推动个人政治主张。这些问题在特朗普看来，不仅破坏了政策执行的连贯性，也削弱了政府整体权威。

紧接着在 4 月 23 日，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简称 OPM）基于上述行政命令的精神，提出了一项新的规定草案。其核心目标在于进一步提升联邦政府职业雇员的责任感与执行力。草案明确规定，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职位，将被重新归类为“政策/职业”类别（Schedule Policy/Career）。这意味着，联邦机构在处理相关雇员因违规行为、工作表现不佳或故意违背总统指令进而损害民主进程等情形时，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决策权，能够更为迅速地采取解雇等管理措施，而无需受制于繁琐的不利行为处理程序或申诉机制。根据这项拟议的规定，约 5 万名在职雇员将受到影响——约占联邦雇员总数的 2%。受影响岗位主要包括管理人员、律师等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环节中拥有重大影响力的群体；而数百万执行层

级的工作人员，如边境巡逻人员以及其他基层岗位不在此列，他们的职位不会因此受到威胁。此外，草案特别强调“政策/职业”类别的职位仍然遵循公开招聘原则，即所有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均可通过既定流程申请。这些岗位在选拔过程中不会将应聘者的个人政治立场或或对总统的支持态度作为考量标准，真正重要的是其是否具备依法忠实执行政府政策的能力与意愿。

（二）改革进展与社会担忧

尽管行政命令已经发布，但其具体实施细则尚未完全明确。命令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提交名单，推荐哪些岗位应被重新划入“政策/职业”类别。这意味着，最终的执行效果将高度依赖于各部门与总统之间的互动。而人事管理办公室也被要求出台进一步的指导意见，以确保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的统一性。然而，由于相关岗位的范围和定义并不清晰，外界普遍担心这一过程可能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政治化色彩。换言之，改革在制度上提供了框架，但其最终走向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讨论的深入，社会争议逐渐加剧。2025年8月，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发布7月就业数据，显示失业率上升，同时下调了前两个月的新增就业岗位。这一结果引发了特朗普的强烈不满，其公开指责该局局长埃丽卡·麦肯塔弗(Erika McEntarfer)操纵数据，甚至声称其曾

在 2024 年偏袒拜登。最终，特朗普下令将其解雇。尽管劳工统计局局长本就属于自由雇佣职位，并不在此次改革范围内，但此事仍被舆论解读为未来趋势的缩影。批评者担心，随着改革推进，越来越多原本应保持中立的技术岗位，也可能因被认定具有“政策影响力”而随时面临解雇风险。

与此同时，不少专家也对改革标准的模糊性提出批评。前劳工统计局局长埃里卡·格罗申（Erica Groshen）指出，那些追踪就业、通胀、工资及其他经济指标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其他分析人员也可能因此被视为“政策岗位”而随时遭解雇。如果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改革可能会被无限扩大解释，进而侵蚀公务员体系的中立性。更严重的是，这种不确定性或将削弱联邦数据和政策分析机构的公信力。对于依赖数据制定政策的现代政府而言，一旦外界怀疑关键数据受到政治干预，其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都将遭受冲击。因此，尽管特朗普改革的初衷是提升效率和问责，但其潜在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二、上述改革的影响分析

（一）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所推动的改革，其核心在于强化总统对联邦机构的掌控。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不少倾向民主党的联邦雇员凭借手中实权，多次成为其政策推行的阻力。特朗普曾屡次抱怨，白宫发布的政令往往难以

有效落地，仿佛“出不了总统府”。而在这些雇员看来，他们的抵制并非出于党派立场，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宪政体制，防止其遭受特朗普的“侵蚀”。《国会山庄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75%的资深联邦雇员（其中大多数在2024年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公开表示，他们将违抗不认可的政策指令。这一数据不仅揭示了特朗普在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阻力，也预示着其在第二任期内的政策执行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曾指出，美国外交长期受到一个被称为“圈层”（the Blob）的群体主导。该群体由跨党派的外交政策精英组成，凭借深厚的人脉网络和丰富的外交经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特朗普执政时期所独有，而是在不同政党执政阶段都以不同形式显现。回顾过往，在民主党掌权时期，同样存在持保守立场的联邦雇员对政令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暗中抵制的情况。以奥巴马执政初期为例，其政府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

（DACA），旨在为童年随父母非法入境的无证移民提供暂缓遣返的机会，使其能够在美继续学习、工作与生活。然而，这一计划在落地过程中却遭遇明显阻力。部分移民执法官员，尤其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内部人员，被曝出在

执行中态度消极。他们不仅未积极落实相关保护措施，反而通过拖延手续、怠于履职等方式，令大量原本应受益的无证移民未能及时获得庇护。

由此可见，联邦雇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态度，并非单一政党所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跨越时期、跨越党派的复杂政治现象。其背后既反映了政治理念的分歧，也折射出官僚体系的利益博弈与制度惯性。特朗普的改革正是试图削弱这种制度性掣肘，使总统命令能够更顺畅地落地。然而，这种做法是否能够在行政效率与官僚中立之间找到平衡，仍存在巨大争议。未来，美国政治或将面临更深层次的制度性重构考验。

（二）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涉华政策的影响

在对外政策层面，特朗普的改革同样可能带来深远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深受鹰派官员和外交建制派的影响，他们普遍主张以强硬手段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立场在两党之间几乎形成共识，使得对华强硬成为美国政坛的“政治正确”。然而，特朗普本人在对华问题上展现出与传统鹰派不同的思维方式。他更倾向于将对华关系视作交易与博弈的筹码，试图通过灵活的谈判与利益交换为美国获取最大化利益。在他看来，过度的意识形态对抗会压缩外交操作空间，而灵活的利益安排则能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随着《恢复联邦政府部门中政策制定职位的问责机制》

这一行政命令的正式生效，美国外交“圈层”中那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建制派人士，可能会面临被大规模撤换的命运。这不仅为特朗普推行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非传统外交战略扫清障碍，也意味着在对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联邦官僚体系将更加紧密地围绕总统意志运转，从而减少制度性掣肘。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在他的执政理念中，几乎所有外交政策和行动都服从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交易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他善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寻找利益平衡点，通过谈判、妥协和交换来获取所需。因此，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新一轮的对华政策将更趋向于交易博弈而非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关系在某些关键议题（如贸易或技术领域）上，可能出现有限的妥协，而在高度敏感的领域（如台湾问题）则仍将保持强硬，但手段或将更具灵活性和策略性。

对中国而言，这一转向既意味着挑战，也孕育着机遇。挑战在于，特朗普政府仍会在战略层面维持对华竞争和防范的基本立场，不会轻易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框架。但与此同时，其政策取向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色彩，更强调短期利益和具体结果，而非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这为中美在特定议题上达成妥协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需要在坚守核心利益底线的同时，善于利用特朗普的交易思维，积极寻求可供交换与合作的空

间，从而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实现相对平衡。

三、对我国的启示

特朗普的改革表明，美国政治正在经历一场“去建制化”与“行政集中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在西方多国都有所体现。例如，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梅洛尼、德国选择党的魏德尔等右翼乃至极右翼领导人，均面临与特朗普相似的困境：他们早期被传统建制派以“极端化”叙事加以边缘化，但随着民粹力量逐渐进入主流政治舞台，这些政党开始在国会中获得话语权，甚至直接执政。执政后，他们往往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削弱被视为政策推行阻碍的官僚体系与独立机构。由此，清除或“驯服”建制派官僚，正成为西方多个国家的现实政治议程。这种现象折射出社会对传统精英长期积累的不满，以及民众对政治效率与政策执行力的更高期待。短期内，这一趋势或许能够满足部分民众对政策“快速见效”的需求；但长期而言，它可能削弱制度的制衡功能，改变西方民主的运行逻辑，推动其向行政集权化与务实化转型。

这种政治逻辑的变化同样深刻影响着西方的对外政策。过去，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常以“民主与自由”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叙事，通过价值观外交来塑造国际秩序。理想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政策制定者愈发少依赖抽象的价值话语，而更多基于国家利益作出

务实选择。这一转向可能在对华政策中更加凸显。未来，西方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或将减少意识形态化的批评，转而更加强调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及现实博弈。在某些领域，这为中西方关系减轻对立、推动务实合作提供了空间；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因为西方国家可能在不同议题上采取“选择性合作与竞争”的灵活策略。

AI 国际政经观察

01 中美 AI 路线：多边与“优先”的鲜明对比

7月26日，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开幕，吸引800余家企业参与，机器人、飞行出租车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国际嘉宾的到场，也让本届大会的国际关注度远超往届。展会上，阿里巴巴、DeepSeek等国内企业的开源模型成为众多产品的技术基础，这与去年依赖Meta、OpenAI模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直观体现了中国愿与世界分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的愿景。

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背景下，此次大会成为中国展现技术愿景的重要窗口。李强总理在会上宣布，计划在上海成立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设立两个新的联合国人工智能监管对话机制，这一举措被广泛解读为中国与美国的技术路径划清界限。此前数日，美国推出“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其内容聚焦自身优先事项，延续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与之相对，中国则以多边主义为导向，倡导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中国借WAIC清晰展现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

专家点评：中国通过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

展现的“开源合作+多边治理”路线，不仅是对美国“优先主导”战略的直接回应，更暗含着对全球技术权力分配的长远布局。这种战略选择既体现技术输出的创新路径，也凸显全球治理的理念分野。

开源模型（如 DeepSeek、阿里通义）正成为撬动“数字南方”的关键支点。中国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定制本土化 AI，将技术共享转化为“主权 AI”的赋能工具——蒙古用国产模型搭建草原生态监测系统，哈萨克斯坦基于阿里通义开发多语种政务助手，印尼甚至计划在 40 万所学校推广中国开源教育 AI 工具。这种“授人以渔”的策略，既绕过了美国以芯片封锁构建的排他性联盟，又将技术标准自然渗透为地缘影响力。反观美国，虽掌控尖端芯片生态，却因技术封闭性和出口管制陷入悖论：其对算力的严格限制，反而倒逼中国形成“模型优化+国产替代”的替代性输出网络，华为昇腾芯片与 DeepSeek 混合专家架构的协同，已在部分场景实现对英伟达系统的性能追赶。

国际媒体的观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战略分野。美国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社》直接点明，中国在 WAIC 上倡导“团结合作”，宣布成立“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目标直指防止技术被少数国家垄断；而美国同期推出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则将 AI 定义为“必须赢得的竞赛”，字里行间透着“单边主导”的思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以《中

国提议建立全球 AI 治理组织，而美国则要单打独斗》为题，更直白地揭示路径差异：中国试图通过多边机制凝聚规则共识，美国却延续“技术霸权”逻辑，甚至要求盟友同步限制对华技术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从技术生态角度补充了细节：中国企业的开源策略已形成实效，阿里巴巴、DeepSeek 等模型不仅性能超越美国开源竞品，更允许全球用户免费修改部署，这种开放模式与美国企业的闭源商业化形成鲜明对比——前者通过共享扩大影响力，后者则因垄断加剧技术鸿沟。

当中国开源模型在全球开发者平台的下载量突破 4 亿次，当“数字南方”国家用中国技术构建自主 AI 系统时，技术治理的话语权天平正悄然倾斜。这不仅是技术路径的选择，更是发展理念的分野：中国以“开源合作”打破技术垄断，用“多边治理”平衡利益分配，为全球 AI 发展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方案。

02 特朗普计划向中国有偿打开 AI 大门

据英国《金融时报》8 月 12 日报道，特朗普颠覆了长期以来的企业规范，同英伟达和 AMD 达成协议，同意出口指定芯片至中国，但是需要将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部分收入上缴美国政府。特朗普强调，允许英伟达卖给中国的芯片本质上是一款很老的芯片，华为目前也有类似功能一样的

芯片。实际上，美国政府于4月份出台了新的许可要求，直至上周，一直终止 H20 在中国的销售。

美国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希望可以促成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峰会。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已被告知冻结中国新的出口管制，以防止危及与中国举行峰会的机会。但美国官员对于该项举措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认为出口管制是保护美国安全的重要防线，不应开放先例向中国出售 AI 技术，这可能会导致国家安全被损害。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的巴特尼克表示：“这本质上就是对联邦政府的回扣，因为联邦政府允许 Nvidia 和 AMD 破坏美国国家安全。”

专家点评：此前，暂时没有公开记录的案例显示企业直接上缴其在外国市场的销售收益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曾通过商务部和财政部对某些技术的出口进行限制，这种行为在法律和国际商业交易上是不常见的。该项费用似乎是对于美国宪法的挑战，宪法明令禁止了“出口税”。

但在特朗普的口中，此项费用并非关税，也非罚款，更像是一笔为了获得市场准入而支出的“保护费”，直接对特定芯片在中国市场产生的收入进行抽成，意味着无论英伟达和 AMD 的盈亏情况，他们都需要将 15% 纳入美国政府的口袋。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 Timothy P. Carney 表示，特朗

普是在试图通过这次“勒索”来让自己或他的政党致富——这笔钱将减少联邦赤字，但是本质上来说，整个事情仍然是在滥用职权。

通过“保护费”换得了“出口权”是一个信号，这预示着中美科技领域的规则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曾经由法规构建的贸易壁垒战略框架，似乎正被一种直接交易和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收费”模式所取代。

对于美国本土企业来说这次放宽出口限制是一把“双刃剑”，上一财年英伟达和 AMD 在中国区的收益占总销售额的 13%—25%，如果开放中国市场出口，未来预计可以恢复禁令前的收益水平。然而，在此次博弈当中，美国企业也要承担“风险转化”的风险，因为他们将会面临高昂的运营成本，即缴纳的 15% “保护费”。

AI 供应链是全球性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指出美国无法独立的生产所有产品，虽然短期内美国放开芯片限制某种程度上减缓了全球供应链的压力，但是美国此次“政企关系”的变化很可能是中国引进外资、外企、境外专家的绝佳时机。美国的政策改变制造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窗口。

03 特斯拉与三星达成价值 165 亿美元的 AI 芯片代工协议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30日报道，三星与特斯拉签署 16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190 亿元)的 8 年代工合同(2025—2033 年)，为特斯拉生产下一代 AI 芯片，即 AI5 和 AI6 两款芯片。马斯克在 X 上发帖称：“三星在得克萨斯州新建的巨型工厂将专门用于生产特斯拉的下一代 AI6 芯片。其战略重要性毋庸置疑。”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还在 X 平台直言：“165 亿美元只是最低金额，实际产出可能高出数倍。”这意味着三星德州泰勒工厂未来可能需要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特斯拉对 AI6 芯片的需求。消息公布后，三星股价应声上涨 6.8%，创去年 9 月以来新高，市值单日激增超 200 亿美元。

专家点评：不同于普通芯片，AI6 芯片是支撑特斯拉自动驾驶和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核心算力引擎。AI6 芯片采用 2 纳米工艺，单颗芯片算力是当前主流车载芯片的 10 倍以上。根据马斯克的规划，未来每辆特斯拉汽车都将搭载至少两个 AI6 芯片，配合云端超算形成“车云一体”的智能驾驶体系。而人形机器人“擎天柱”若实现年产 10 亿台的目标，对 AI6 芯片的需求将呈指数级增长。

“美国 AI 巨头+芯片代工巨头”的模式，对于双方而言

是一种“双赢”。特斯拉需要三星来推动供应链本土化和多元化，三星也亟需美国巨头的订单。对于特斯拉而言，三星是特斯拉垂直整合野心的重要一环。特斯拉积极构建“台积电+三星”双供应链的战略布局，通过三星代工生产自研芯片，减少对台积电的依赖，同时构建 AI 从自动驾驶到机器人的全栈能力，强化 AI 机器人服务型业务的竞争力。对于三星而言，这一大额订单将有助于其扭转亏损，追赶台积电和应对国内同行 SK 海力士的竞争。截至 2025 年第一季度，三星晶圆代工全球份额仅 7.7%，中芯国际紧随其后占 6%，而台积电为 67.6%。导致三星落后台积电的根本原因，是三星的 2 纳米工艺目前良率约为 40—50%，低于台积电 N2 工艺（良率 70%以上）和英特尔 18A 工艺（良率 50—55%）。2023 年上半年，三星代工部门亏损超 55.7 亿元，产能利用率不足 50%，德州工厂因缺乏大客户一度面临闲置危机。彭博社分析指出，这份合同将直接为三星带来每年约 20 亿美元的代工收入，占其代工业务总营收的 15%以上，有望帮助其扭转连续两年的亏损局面。

然而，三星为拿到特斯拉的“大合同”，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体现出在中美 AI 竞争的背景下，以及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下，日韩等代工厂的生存法则。为拿到这份合同，三星打破常规，允许特斯拉工程师深度介入产线优化。马斯克透露，双方将联合开发“生产效率最大化”方案，这

意味着三星可能首次向客户开放核心工艺数据。这种工艺和战略的双重让步在半导体代工领域极为罕见，足见三星对这笔订单的重视程度。

04 OpenAI 发布开源模型与中国的 DeepSeek 开展竞争

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日报道，当地时间8月5日凌晨，OpenAI 再次回归开源，并发布两款全新的大语言模型，GPT-oss-120b 和 GPT-oss-20b。这两款模型完全免费，允许企业和独立开发者下载代码并根据需求修改，且可本地运行以确保最大隐私。此外，这两款还可以在高端笔记本和手机上运行。这是自 2019 年 GPT-2 开源后，该公司时隔六年再次重返开放生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款模型属于开放权重（open-weight）大语言模型，不提供训练数据和完整训练代码，但权重可以公开获取、可以下载、自主部署。当天，OpenAI 的 CEO 奥特曼罕见地表态称，OpenAI 在开源 AI 软件方面“一直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专家点评：实际上，目前的开源都不能称作真正的开源，因为本质上权重（以及推理代码）不是源代码。这种“半开源”的模式最早是从 Meta 的 llama 模型开始的，llama 采取这种方式，主要是因为竞争对手 OpenAI 的 ChatGPT 最早从

开源的方式中颇为受益，结果在取得一定进展之后马上转为闭源，导致各个大模型公司全都转为闭源，因此奥特曼“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说法不为过。虽然源代码未开放，但权重可用也相当重要。权重可以理解为大模型的一种参数。在大模型领域，企业训练模型，就是通过不断更新模型的权重，最终得到一个泛化能力比较强的模型。同样，如果不训练，仅仅随机初始化权重，也能够得到一个同样大小的模型。虽然两者大小一样，不过两者其中的权重信息分布相差会很大，实际的运行效果也会存在较大差距。

然而，**OpenAI** 开源的尺寸不够大，“诚意”略显不足。本次开源的最强模型仅 **120b**，相比其它厂商开源的最强模型都小得多。与国产的开源大模型相比，DeepSeek R1 有 671b，阿里巴巴 qwen3 有 235b，kimi k2 大约有 1040b。这里的“b”是“Billion”（十亿），指的是模型的参数数量。数量越多，通常意味着模型更聪明、知识更渊博、能力更强。总体上，**OpenAI** 模型开源给电脑端的模型增加了一个选择，但仅限于文本模型。未来 oss 开源系列是否还会有更多模态的好模型，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OpenAI 的开放模型是技术让步，也是地缘博弈下的生存策略。**OpenAI** 从闭源付费转向免费开放，试图以“美国民主价值观”为背书推广技术栈。**OpenAI** 的转型证明，即使行业巨头也可能因外部竞争被迫颠覆原有商业模式，技术

公司的战略灵活性决定生存权。实践证明，开源模型降低 AI 研发门槛，中国初创借开放生态快速崛起，打破硅谷垄断。如今，开源已成 AI 竞争关键赛道，中国企业开源模式的突破迫使 OpenAI 等美国巨头调整策略，全球 AI 主导权争夺进入“透明度竞争”阶段，中国企业要进一步在开源模式的赛道上保持竞争优势。

05 美国《外交政策》：精妙管控芯片，方能拴住中国 AI

美国《外交政策》指出，若要通过芯片管控牵制中国 AI 发展，需采取精准策略。具体来看，中国虽在 AI 领域成果显著，但算力高度依赖先进半导体，而美国在总计算能力上仍保持十倍优势。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尤为显著：即便使用性能降级版本，仍通过囤积、走私等方式竭力获取。

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企业购入约 100 万块英伟达 H20 芯片，而华为昇腾 910B 出货量仅 45 万块。背后原因有三：一是硬件性能差距，英伟达降级芯片在内存带宽等关键指标上仍优于华为产品（如昇腾 910B 内存带宽仅为 H20 的 40%）；二是软件生态壁垒，英伟达 CUDA 平台成熟且与主流框架深度融合，而华为 CANN 和 MindSpore 尚处完善阶段，存在技术漏洞；三是供应与竞争顾虑，华为芯片受设备管制导致供

应不稳、良率偏低，且作为云服务与 AI 模型领域的竞争对手，也让其他企业心存顾虑。

不过，中国芯片企业正加速追赶：华为昇腾 910C 性能提升，其 CloudMatrix 系统在部分维度已超越英伟达同类产品；寒武纪等企业也取得突破，字节跳动等企业开始尝试合作，英伟达在华市场份额已从 95% 降至 50%。对此，《外交政策》进一步指出，美国需制定精细管控策略：设定动态性能阈值，既确保对华可售芯片性能高于中国国产芯片以维持吸引力，又与美国本土芯片保持差距，避免倒逼中国完全转向自主生态。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合理管制，持续巩固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

专家点评：美国《外交政策》提出的“精妙管控芯片，方能拴住中国 AI”策略，虽反映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核心思路，但并非美国朝野一致的共识。从特朗普政府撤销拜登时期《人工智能扩散暂行最终规则》却加码对华限制的矛盾操作，到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公开反对过度管制，均显示美国内部在“遏制中国”与“维护商业利益”之间存在深刻裂痕。商务部与国务院在管制尺度上的博弈、企业游说与国会立法的拉锯，凸显出这一策略的脆弱性——它既是技术霸权的体现，也是美国对自身优势衰减的焦虑投射。

美国的管制政策始终在“限制”与“留余地”间摇摆。

特朗普政府曾逆转 H20 芯片禁令，正是担心失去中国市场会加速国产替代，而英伟达在华市场份额从 95% 降至 50% 的现实，更印证了过度压制的反效果。所谓“动态性能阈值”策略，实则是试图在技术优势与市场吸引力间维持平衡——既让中国企业依赖性能略优的美国芯片，又避免倒逼其完全转向自主生态。这种“精准遏制”逻辑，恰恰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市场规模与技术韧性的忌惮。

对中国而言，破局关键在于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政策层面，通过政府采购倾斜、国产芯片采购比例硬性要求（如国企采购国产芯片比例提升至 50%），为本土企业创造应用场景；技术层面，华为昇腾 910C 性能提升、CloudMatrix 系统部分超越英伟达产品，以及开发者社区四年增长十倍的势头，证明生态培育需政策持续支持。美国近期出台的“全球禁用昇腾芯片”禁令，反而凸显了华为生态的潜在威胁——当昇腾芯片在算力密度、能效比等指标上逼近国际水平时，其开源框架 MindSpore 与 CANN 工具链的完善，正在动摇美国的生态垄断根基。

06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大国竞争关键在于人才之争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于 8 月 1 日转发评论文章直指中美竞争背景下人才之争的紧迫性。文章称，历史上

一小批卓越人才在推动技术变革方面往往扮演着不成比例的重要角色。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正步入另一场军备竞赛。二战历史提醒我们：在军事技术竞争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在全球争夺通用人工智能（AGI）主导权的博弈中，虽然算力集群、半导体出口管制和大语言模型等技术资源不可或缺，但更具决定性的将是对 AI 人才的精细管理与战略部署。文章认为，AI 人才战略可沿三条主轴展开——它们不是彼此独立，而是高度互动、相辅相成的：保住本土 AI 人才、吸纳外来 AI 人才、削弱对手 AI 人才。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加强并维护一个强大而可持续的本土 AI 人才库。尽管美国仍具备对海外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但其本土高技能或专业人才的储备已日益不足，难以在 AI 领域与最强劲的对手（中国）展开有效竞争。对此，一是要防范“敌对势力对本土 AI 人才的掠夺”，即阻止扎根硅谷的中国科技公司从 OpenAI、Meta、谷歌等企业“挖走”核心 AI 专家。此外，在前沿 AI 研究与军事应用高度关联的背景下，任何帮助中国推进“军民融合”战略、为字节跳动、阿里、美团等中国科技企业工作的行为，都应受到公众强烈谴责，或需要出台新的行政命令，禁止本国公民在中国 AI 公司任职。第二条关键路径，是制定更有效的 AI 人才引进战略，构建一套量身定制、跨党派支持的移民政策。美国若想在 21 世纪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取胜，就必须引进大量高技

能移民，最好是具备归化条件、愿意宣誓效忠、可为政府服务的技术移民。这将是弥补国内人才缺口的唯一现实出路之一。

在捕获外国 AI 人才方面，关键在于吸引并留住全球 AI 人才。建议通过国会设立一类全新的永久居民类别，专门针对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中拥有高级专长的人才，并分配相应的绿卡配额，为他们提供归化途径。美国历来以其高薪的白领岗位、深厚而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世界级大学和可靠的法律体系，持续吸引着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企业家。目前，亟需通过更加创新的方式将这些人才资源留在美国，例如向所有从美国认证大学获得 STEM 博士学位的学生授予绿卡、为外国出生的创业者设立新的创业签证类别等。

最后，美国还应更具战略性地思考——不仅要打造本国人才体系，还要主动削弱对手国家的人才资源，并将其在经济、文化与智力方面的软实力优势用作遏制主要竞争对手的武器。例如在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超过 10 万名信息技术专家离开了俄罗斯。同年，拜登政府曾提出为拥有“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STEM）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俄罗斯人取消部分签证要求，所涵盖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半导体和机器人技术。此外，美国必须提前识别出在 AI/AGI 竞赛中至关重要的关键人物，并

确保其免受竞争国家人身威胁或敲诈勒索。

专家点评：中美在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中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层面，中美相继出台政策，限制 AI 人才的流动范围及任职公司；其中，中国更是推出了多项政策，积极吸引、留住并促进 AI 人才回流。在企业层面，美国公司可谓“豪掷千金”。据报道，AI 人才的争夺促使 Meta(原“脸书”，Facebook) 开出了高达 1 亿美元的签约奖金，以吸引竞争对手的高级员工(包括 OpenAI、苹果)。而在美国科技巨头们引以为豪的超级人才中，很多都来自中国：**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团队的 12 名新成员中，有 8 人毕业于中国大陆的大学，之后才赴海外发展。**这意味着，全球 AI 竞赛的关键推动力之一是对华人 AI 人才的激烈争夺。数据表明，全球顶尖 AI 研究人员中，几乎一半来自中国，而来自美国的比例为 18%。相比美国通过高薪留人的动作，中国一方面积极打造本土 AI 人才，另一方面积极促进 AI 人才回流，以达到扩充 AI 人才库的目的。斯坦福大学今年 5 月份的一项研究表明，该公司的成功故事“本质上是一个本土人才的故事”。DeepSeek 团队中有一半成员从未离开中国求学或工作，而那些曾出国的人最终也选择回国从事人工智能开发。而 DeepSeek 在吸引海外华人 AI 研究人员回国方面，不仅靠金钱（相比美国的巨额高薪并无优势），更在于让员工相信，他们的贡献将在历史书上留下

浓墨重彩一笔，以期通过创业与思乡情怀打动中国人才。

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就吸引和留住 AI 人才方面尚未制定专项措施，这或许是我国抢占 AI 人才的一个窗口期。我国也可借鉴三步走策略：保住本土 AI 人才、吸纳外来 AI 人才、削弱对手 AI 人才。首先，保住本土 AI 人才是人才战略的基础。应通过优化科研环境，完善薪酬激励、职称评审和科研支持机制，增强人才归属感。并积极改善人才生活配套服务，如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切实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此外，还应强化职业发展通道，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人才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提升人才留存率。

其次，吸纳海外优秀 AI 人才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应放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绿卡便利，设立专项引才计划。通过校友会、行业协会和海外科技园区等渠道，精准开展定向招聘和持续跟踪服务。同时，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与海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创新中心，促进人才的双向流动。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进一步增强海外人才归国发展的意愿和信心。

第三，削弱对手 AI 人才优势是防止人才外流和争夺的重要环节。面对美国等国高薪挖角的压力，我国应加大海外人才联络和服务力度，建立“人才侨务+科技创新”联合机制，主动维护海外人才关系。同时，通过实施具有吸引力的前沿科研项目和产业应用，吸引海外人才参与国内创新。利

用外交和政策杠杆推动人才回流，努力实现人才流动便利化，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此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人才科研成果权益，增强他们在国内发展的信心 and 安全感。

07 DeepSeek 的下一个 AI 模型因尝试使用中国芯片而延迟发布

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4日报道，DeepSeek 因使用华为芯片训练其新模型 R2 失败而推迟发布，凸显了北京力争取代美国技术的局限性。DeepSeek 在1月发布 R1 型号后收到当局鼓励，采用华为的 Ascend 处理器，而不是使用 Nvidia 的系统。然而在此期间遇到了持续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是从5月份推迟上市的主要原因。

报道认为中国芯片在关键任务上仍然落后于美国，中国在实现技术自给自足方面面临挑战。同时，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芯片存在稳定性问题，芯片间连接速度较慢以及软件较差等问题。但是，行业专家呈现出了相反的观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AI 研究员里特维克·古普塔(Ritwik · Gupta)表示：“模型是可以轻松替换的商品。很多开发者都在使用阿里巴巴的 Qwen3，它功能强大且灵活。”

消息人士称，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曾在内部表示，他对 R2 的进展不满意，并一直在努力投入更多时间来构建一个能够维持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地位的先进模型。

专家点评：英伟达作为 AI 行业的“标准供应商”，不仅提供硬件，还构建了完善的软件生态，促进 AI 开发的效率和创新。英伟达通过建立 CUDA 生态系统，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和先发优势，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截至 2023 年，英伟达在 AI 计算和深度学习 GPU 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 70%，这种市场份额使得 CUDA 成为了 AI 领域几乎不可替代的计算平台。目前，许多中国领先的 AI 企业，例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在研发和部署当中均采用了英伟达的 GPU。国产芯片技术仍然存在追赶阶段，英伟达芯片在高端算力市场仍占据主导地位。

DeepSeek 使用华为芯片体现了中国计划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战略布局。同时，深耕国产生态，推动自主产业发展是中国 AI 发展的重要战略。DeepSeek 使用华为芯片可以更好的嵌入国产平台，促进国产芯片的市场保有率，提高国内产业链的主体竞争力。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对中国 AI 研发既是挑战，也是推动力量。一方面，它促使中国加快自主创新步伐，重视基础研究和产业链自主化；另一方面，也带来合作受限、技术封锁等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对 AI 和芯片的发展应当保持平衡的态度，在意识到中美技术的差距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创新的能力和韧性。例如，DeepSeek 在自主研发方面取得的突破，以及华为推出的七纳米芯片等重大成就，都展

示出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潜能。在这场“中美 AI 之争”当中，平衡且理性的态度才能帮助中国 AI 的持续发展，实现自主可控的目标。

08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美国 AI 全球战略的难点不在于技术输出，而在于推动其真正落地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 8 月 15 日发表评论指出，美国若要在全球南方 AI 市场胜出，必须说服伙伴国“共建”而非单纯“接受”技术输出。对此，文章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聚焦具备数字基础、渴望发展但缺乏资本与算力的国家（如肯尼亚、尼日利亚等），不宜在制度薄弱、高风险市场硬碰硬。二是尊重合作国家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合作方案。比起单纯的 AI 技术输出，真正有吸引力的合作应帮助其培育能力、解决实际难题。三是化解合作国家对“技术被切断”的担忧。许多国家担心一旦外交摩擦就会失去美国 AI 技术服务，美国需以透明且具约束力的协议建立长期信任。四是“民主叙事”的价值观输出难以取信，唯有注重稳定务实的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与长期发展，才能让伙伴国真正押注美国 AI。

专家点评：美国在 AI 全球化过程中面临两个关键难题：一是方案可行性，二是合作信任度，这两点在全球南方国家

尤为突出。与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不同，美国 AI 技术输出更多依赖企业与社会资本，面对数字基础和制度薄弱，或政治不确定性高的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企业往往“望而却步”。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在建设 AI 生态过程中越来越注重 AI 国家主权的建设，并意在打造能为当地发展带来切实经济利益的 AI 应用项目。未来，美国在可行性和信任层面恐怕难有真正突破。首先，在财政与政策层面难以复制中国式的整体性资源投入；其次，美国外交的高度工具化加剧了合作方的疑虑，即便签订协议，也难以消除当地对美可能“断供 AI 技术”的担心。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在可行性上，中国通过“融资、培训和应用落地”模式，成功与肯尼亚打造了“孔扎科技城”项目，具备成熟的落地方案。在信任建设方面，中国通过长期的经贸合作、基建项目以及“共建”理念，逐步积累了信誉。未来，中国应持续强化融资保障、本地化应用与能力建设，并通过透明规则提升合作信任度，以巩固在全球南方 AI 领域的竞争优势。

09 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中国 AI 3C 框架显差异优势

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指出，中国生成式 AI 虽起步晚于西方，却构建起独特的并行生态体系。其核心优势在于：国家主导的模块化、韧性强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快速适配

本土需求；企业通过差异化路径应对模型幻觉、成本控制、监管合规等挑战，全产业链贴合本土特点，与西方通用化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3C 框架”中：一是基础设施定制化（Customization），企业通过模块化系统适配本土技术与监管要求，例如蚂蚁集团的医疗 AI 深度贴合中国医生的诊疗逻辑；二是模型开发成本领先（Cost Leadership），以业务成果为导向，通过垂直整合降低训练与部署成本，用较少资源实现高效能；三是面向实际应用校准（Calibration），聚焦真实场景持续迭代，如中国 AI 公司 Moonshot 的 Kimi 模型支持大篇幅文本处理，精准适配医疗等文档密集领域。

专家点评：《哈佛商业评论》对中国 AI 3C 框架的总结十分精准。在全球算力紧张与市场壁垒增多的当下，这种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韧性与企业差异化创新结合的模式，是中国 AI 突围的关键，也是应持续深耕的方向。

企业实践中 3C 框架的落地场景更为具体。定制化层面，传音不仅为非洲市场开发支持 50 余种本地语言的语音助手，还深度适配当地方言混杂的日常交流场景，嵌入农业技术语音查询等贴合民生的功能，精准匹配区域需求；成本领先维度，DeepSeek 与联想联合打造的制造业 AI 解决方案，通过模型压缩技术和硬件软件垂直整合，将中小制造企业的 AI

部署硬件成本降低超 30%，单条生产线的智能改造投入控制在百万元内；应用校准上，顺丰物流的 AI 路径规划系统，结合不同城市早晚高峰规律、天气变化等实时数据持续迭代，半年内将配送延误率再降 18%，充分体现场景化优化的价值。

3C 深耕国内市场，走向国际需本土化（Localization）、轻量化（Lightweight）、低门槛（Low-threshold）的 3L 策略。本土化如传音针对非洲小语种开发翻译引擎，贴合当地需求；轻量化像 DeepSeek 将大模型压缩，减少算力需求；低门槛如阿里云提供零代码部署，降低使用难度。TikTok 的区域化运营也证明，把 3C 的实战经验转化为 3L 能力，才能实现从本土优势到全球竞争力的跨越。3C 是根基，3L 是杠杆，二者结合方能构建 AI 发展双循环。

10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过度激进的对华 AI 芯片出口禁令恐将适得其反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8 月 15 日发表评论指出，限制中国获取高性能 AI 芯片，反而会加速其自主研发与生态建设的速度，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AI 竞争胜负不仅取决于驱动数据中心的芯片，还依赖数十亿边缘设备，如手机、笔记本、智能汽车和工厂自动化系统。未来 AI 解决方案将越来越依赖“边缘+中心”的混合算力模式。

华为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市场渗透率极高，庞大的终端设备基础使这些地区在建设 AI 数据中心时更倾向于打造“全华为生态”。若美国芯片优势仅“略强”甚至“不再领先”，华为的边缘设备优势将推动更多国家构建纯华为体系。届时，即便美国本土芯片产业仍具实力，也可能在全球 AI 竞争中落于下风。因此，美国应允许英伟达（Nvidia）、超威半导体（AMD）等企业对华出口高性能（但非最尖端）芯片，同时将战略重心转向打造全球 AI 生态首选供应商——既包括数据中心芯片，也包括边缘设备的全球部署。

专家点评：随着 AI 技术普及，传统“云端中心”计算模式正向“边缘+中心”的混合算力架构转变：数据中心负责模型训练和大规模推理，边缘设备承担低延迟推理、本地数据处理及应用落地。这意味着全球 AI 竞争格局已从单纯芯片性能比拼，转向终端设备生态构建和边缘计算能力的综合能力竞争。构建强大的边缘设备生态系统，成为国家在 AI 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

边缘计算将数据处理前移至设备端，降低对远程服务器的依赖，实现低延迟、高效率的实时决策。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智能汽车等终端设备可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以及在智能制造生产线、机器人和传感器等终端设备上部署 AI 模型，实现实时监控、预测性维护和智能调度，提升生产效

率与安全性，同时保证设备在网络条件不佳或偏远地区依旧能稳定运行。

中国在终端设备生态构建方面的优势明显。首先，中国本土厂商在硬件、操作系统、云平台和应用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闭环，例如华为的芯片与鸿蒙系统深度整合，支持边缘设备与云端协同，提升了设备互操作性和整体 AI 系统效率。此外，中国厂商在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渗透率高，终端设备和基础设施部署为这些地区建设 AI 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提供了先天优势。未来，我国可持续通过提供统一品牌和生态方案，在海外推广“全链条 AI 解决方案”，扩大我国 AI 生态国际影响力。

社会问题与改革参考

01 “苏超”爆火下的城市治理启示

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俗称“苏超”）的出现，迅速激起了公众超乎寻常的热情。短短一个赛季，这项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便从地方走向全国，成为广泛热议的现象级话题。“苏超”带来的不只是表面的经济热闹，更是一场关于地方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生动叙事。赛事中充满趣味性的城市对决与互动，使城市原本模糊的文化变得清晰而有生命力，让市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归属。这种叙事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地方共同体意识，使“苏超”从一场体育赛事转变为地方治理的文化载体。那么这样一场原本并不起眼的地方性，娱乐性的足球比赛，如何轻而易举地激发了城市居民的强烈认同感？“苏超”的经验能为地方社会治理提供怎样新的思考与启发？

一、草根动员与在地文化融合成就现象级“苏超”

与主流的专业赛事相比，“苏超”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草根作为事件的主体，本土文化与赛事IP的紧密结合。

“苏超”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成为现象级的文旅体育品牌，首先源于其彻底草根化的参与结构。在这项联赛中，每队允许至多3名现役职业球员，其余席位必须由在本市有户籍或社保的业余选手填补。516名注册球员里，超过65%都是平日要打卡上班的普通人——有在中学教书的语文老

师，也有送外卖的骑手、写代码的程序员，年纪从 16 岁到“奔四”不等。球员和看台上的观众往往彼此认识：也许昨天还在同一家小店排队买早餐，今天就在球场为对方加油。这种近乎“邻里联赛”的氛围，让每一场比赛都像社区节日，远比职业联赛更容易激发城市归属感。

政府和官方媒体本次没有走传统的“我说你听”路线，而是放下“正经”姿态，干脆加入热闹。当地书记、市长隔三差五出现在看台高呼口号；省级电视台干脆开设“梗博士”短节目，把网友自制的搞笑片段剪进每日集锦。最火的一条弹幕——“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就是官媒拿网友段子改编后推上热搜的。官民同框“整活”，既抬高了比赛热度，也让官方形象显得更亲切、更有趣、更焕发活力。

在以草根自媒体为主的传播生态的推波助澜下，这股线下热情扩散到了全网。抖音里与“苏超”相关的话题累计播放量已破 8 亿，单场比赛网络直播同时在线观看量常年维持在 30 万左右。短视频、二创表情包、球员花絮层出不穷，网友在线上玩梗后，又组织包车线下“赶场”。就这样，一条“网上火——现场更火——再回网上更热”的循环快速成形，把原本定位为省级业余联赛的“苏超”推成了全国都在围观的现象级话题。

与此同时，“苏超”还把比赛和本地文化拧到了一起。联赛的 13 支球队直接用城市命名，一听队名就知道它代表

哪座城。组委会和网友又给每场较量加上带梗的标题，让比赛自带故事感，比如，南京对无锡叫做“苏南德比”，双方球迷在社交平台互相调侃“谁才是真正的太湖主人”。这些别称很快就火遍网络，让原本不熟悉江苏地理的观众，也能在笑声中记住各城特色。各赛区把主场办成了小型文化节日。扬州主场中场休息时不放广告，而是把非遗项目请进场：师傅当场示范剪纸和漆器描金，球迷趁中场逛一圈，就像进了迷你民俗展。常州干脆给球票捆绑“9.9元+萝卜干炒饭”套餐，球迷一进门就能尝到地道小吃；比赛结束后推出印着队长卡通形象的“T恤”和“南哥”围巾，当天卖到断货。无锡赛后直播“云游鼋头渚”，把樱花景区“嫁接”到足球话题里；连云港主场则顺手办了“海鲜美食节”，让观众看完球再去吃螃蟹。

这些花式操作把原本90分钟的比赛扩展成了半天甚至整日的城市体验：观众上午看球、午休逛展、傍晚拍照打卡，最后把照片和段子发上网，留下一连串“我在××主场”的定位。于是，比赛成了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而城市文化又反过来给比赛加了戏。

最终，这两个特点促成了显著的文旅消费爆发效应。“苏超”场均接近1.5万人次，第五轮攀升至3万余人，这个观众数已超中甲，接近中超整体水平。以6月21日常州主场为例，当日现场观众达到36,712人次，其中外省球迷超过1

万人，景区门票预订同比增长 300%以上，扬州主场周末游客量飙升 80%以上，酒店入住率普遍提升 20 - 30%。据江苏省体育产业集团的测算，整个赛季将带动超过 3 亿元的综合经济收益，平均每个城市增收约 2000 万元，异地文旅消费总额同比增长 14.6%。但是，其组织成本却远低于绝大部分的职业联赛，从公共资源配置与经济增效的角度看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二、社区同共同体叙事

“苏超”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不只是一场足球比赛，更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讲述自己城市故事的平台。这一赛事 IP 充当了符号载体和叙事舞台，将分散的城市居民凝聚为想象的共同体。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经指出，要理解一个地方的人们怎样形成共同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就需要关注当地人平时习惯讲述的故事和使用的符号。比如，在巴厘岛上，当地人举办的斗鸡比赛表面上只是娱乐，但实际上是当地人通过斗鸡比赛讲述自己的身份和故事，以形成地方性知识，此增强相互间的联系。同样道理，“苏超”赛事看似一场足球比赛，实则成为江苏各城市“讲述自己故事”的文化剧场。在每一个故事中，人们通过象征性地构建共同体，使之成为意义的资源库和身份的载体。苏超所营造的城市叙事和球队符号，正是这种象征过程的生动体现：比赛赋予城市一个具体化的象征（球队和对手），

市民透过支持“我们”的球队来确认自身属于某共同体，并通过对比“他们的”球队来界定这一共同体的独特性。每当本市球队进球或取胜，全城欢腾的景象实际是在不断重申“我们是谁”。通过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人们更容易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让本来彼此陌生、缺乏交流的居民有了共同的话题和情感联系。

而即使在不同城市之间，“苏超”比赛也逐渐成为了江苏省各城市的共同记忆。通过每场比赛 1v1 的形式带来了独属于这两座城市的人们的特殊记忆和共同话题，居民们逐渐感受到自己不仅属于各自的城市，还属于整个江苏省这样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比如徐州和宿迁的比赛被称作“楚汉争霸”，扬州与淮安之间的较量被网友戏称为“淮扬菜正统之争”。这些故事虽然以幽默和玩笑的形式呈现，但它们成功地让人们记住了每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之间的交织和联系，让不同城市的居民之间产生了情感上的联系。比赛的形式虽然简单，但它却以一种直接、生动的方式，让长期缺乏重叠体验的城市居民重新产生了集体感，实现了把原本孤立的集体凝聚起来的目的。

而在城市身份被“苏超”重新点燃之后，江苏各级政府把这股自发的情感连接转化为一种更柔性的社会治理方法。其核心思想很直白：先让市民在比赛中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的”，再把这种同伴感导入公共事务之中。社会学者常说，

公共信任的基础不是命令，而是参与。当城市居民已经因为同一支球队而并肩呐喊，政府便顺势把自己也置于“同一看台”，以身体力行证明“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监管者”。这种“情感同席”让原本垂直的权力关系，在球场里被重新塑造成平行的伙伴关系。例如，政府让官方媒体和宣传部门加入网络“玩梗”，与民间账号共同生产短视频和段子。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官方声音不再是单一权威，而是融入到多元叙事中，与民间共同塑造城市记忆。政府提供比赛规则与舞台，市民用自己的语言和创意填充内容——双方共同完成公共叙事。用文化认同和象征参与，替代冷冰冰的行政指令。通过限制职业球员、鼓励本地业余选手上场，赛事规则本身也在向市民传递公平、包容、拼搏等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在呐喊、失落、反败为胜的参与体验中被真正“感觉和接纳”。

而对于全国社会来说，赛事中诞生的段子与口号——“楚汉争霸”“早茶 CP”等——像一张张城市名片，在全国社交媒体上流动，全国各地的网友在笑谈之中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进入江苏城市叙事体系。结果是一举两得：省内居民因为共同参与而凝聚，省外网友因为好奇和好感而关注。政府在无形中完成了“内部增强凝聚力，外部塑造城市品牌影响力”的双重目标。“苏超”的传播逻辑成功让地方政府的治理诉求走出辖区，触达更广阔的全国语境。

总的来说，“苏超”告诉我们：要把人心聚在一起，再把这股力量用在城市治理上。第一步，比赛给了市民一个简单又好玩的理由——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大家在呐喊和玩梗中，很自然地认出“我们这座城”的身份，也接受了“公平、拼搏、包容”等共同价值观。第二步，政府并没有站在外面指挥，而是走进球场，同样喊口号、同样玩梗，用行动把“我和你们是一伙的”这句话说得更响亮。这样一来，权力不再生硬，市民也更愿意和政府一起做事。比赛里形成的激情和互信，顺势被带进了公共生活：大家开始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关心城市发展，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帮家乡“拉票”。江苏把一场球赛办成了一个能持续产出认同、信任和城市文化的“情感工厂”。这套做法表明，地方治理不必总依赖自上而下的动员，只要把舞台搭好，让市民愿意上场、乐于创作，政府就能在轻松的文化氛围中获得更深、更持久的公共支持。

三、官民共创构筑服务型治理新范式

“苏超”不仅以其赛事规模和全民参与赢得关注，更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可复制、可深化的社会治理新路径——即政府以公共服务为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载体，达成社会价值引导与治理目标。在此基础上，可得出以下三方面经验启示：

首先，地方政府主动拥抱社交媒体与自媒体生态，引入群众文化参与机制，营造“轻松共创”的舆论氛围。如江苏

各设区市官方媒体在微博、抖音平台上主动玩梗、互动抖机灵，激发大众关注热情并提升公共叙事的参与感。因此，地方部门应鼓励在政府官方账号轻度回应民间优质内容，如球迷创作的短视频、网络段子，将其适度转载并予以官方点赞、转发，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创传播生态，而非传统的监控或禁言式管理。

其次，构建开放式赛事 IP 运营机制，实行政府搭台、社会唱戏的协同模式。据人民日报等报道，“苏超”邀请城市社区组织、社会体育组织、志愿者团队联合策划开幕式、志愿服务及文化活动，实现赛事从“行政布置”到“社会共建”的质变。此外，将地方历史、美食、非遗等融入赛事包装，塑造“城市识别梗”，为赛事注入文化张力，通了地域文化传播通道。

最后，需建立可持续性的激励保障机制，调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共赢。江苏省政府将赛事纳入省政府工作报告，并提供财政支持，同时开通文旅补贴、交通保障、门票优惠等支持措施。赛事组委会联合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将“球票即城市体验券”，通过票根享景区、餐饮、交通等相关权益，实现门票收入向城市体验消费的权利转换。与此同时，政府推进“政企协同”：企业通过赞助取得税收减免，政府则用场馆、安保等公共资源“一肩挑”，形成“政府铺路、企业竞技”的模式。

02 人际疏离：下一个社会“痛点”？

人际疏离影响着全球各地所有年龄段和背景的人群。从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到心脏病和中风等身体疾病，再到早逝，孤独感的影响非常深远。尽管其危害性与其他广为人知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样严重，且解决办法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但是它却常常被大多数人所忽视。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社会联系委员会（the WHO Commission on Social Connection）发布了其最新的全球报告，指出全球接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受到孤独的影响（2014年-2023年数据），同时这一问题在每小时导致了100人死亡，而每年因此问题死亡人数约在87.1万人左右（2014年-2019年数据）。

事实上，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限制性措施对人们日常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负面影响余波仍在。此外，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AI）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从个体和社会层面重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科技变革对社会联系和心理健康影响”这一议题的严重关切。本篇文章将介绍我国当前人际疏离的实际情况和对其原因进行探究。在总结部分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所颁布的政策法规条例基础上，对我国未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我国人际疏离的现状

目前，我国人际关系被扭曲的现象已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第一，人际关系的淡化。**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中亲情、爱情、友情的淡薄。处在情感性关系中的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更多地表现出工具性取向，而较少情感性关怀。由于关系双方缺乏起码的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因而相互间往往缺少应有的信任、理解、尊重、关心。人际关系的淡化使得情感性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不再以相互间的情感为前提，而是以个人具体的物质性目标的实现为前提，从而使情感性关系失去其原初的意义和功能。由于情感性关系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满足个人情感需要的功能，使人们正常的情感需求往往得不到很好的满足，也使人们因工作而造成的紧张心理得不到很好的消除，最终导致人们的心理遭受一定程度的扭曲。现代孤独症和抑郁症都是心灵扭曲的表现。

第二，人际关系的庸俗化。表现为人际关系被简单化为物质利益交换关系。人际关系本身所包含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日益被经济关系所取代。物质利益因素在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际关系的庸俗化一方面使情感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蜕化为工具性关系，使情感性关系亦成为人们实现物质性目标的主要工具之一，从而使处在情感性关系中的人们较少表现真诚行为，进行真情交流，这更加剧了人际关系的淡化。另一方面使工具性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人际金钱关系。金钱成了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砝码，而法律、道德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维系正常工具性关系所必需的公平原则、平等原则不再被人们自觉遵守，取而代之的是自我利益原则。

这一现象在青年群体中的表现则更为明显。根据相关学者的问卷调查，近半数青年更偏好线上社交，三成青年在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中投入的时间差不多。线上社交在给部分青年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一些青年感到更加孤独。调查显示，45.8%的受访者表示将更多时间用于线上社交，24.1%的受访者表示将更多时间用于线下社交，还有30.1%的受访者表示在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上花费的时间差不多。分年龄段来看，除“85后”群体（33.2%）外，其余年龄层群体中偏好线上社交的人数占比都超过五成，人数占比最高的为“90后”群体（57.9%）。线上社交给不同青年群体带来了不同的社交体验。一方面，线上社交没有面对面的社交压力，可以进行更自由的自我表达，并且能够实现跨越空间的畅通联结，56.6%的受访者认为“线上社交能缓解自身的社交压力”。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虽然能够使人便捷地建立联系，但其并不能显著改变部分青年人际关系的疏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49.8%的受访者认为“线上社交有时会让你感觉自己孤独”。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以“00后”为代表的群体其社交更是呈现出与亲戚疏离和依赖网络

圈子两种并存现象。这种对网络圈子的过度依赖，容易造成群体性孤独、线下人际交往能力退化、线上八卦谣言难以管制等系列问题。相较于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大学生网络圈子形成了新“差序格局”。一方面，社交圈层增强了人们人际间的沟通，核心社交圈则是呈现“强关系”态势，并以此推动了其线上社会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圈层固化也会导致信息封闭、“沉默的螺旋”及网络舆情失控。

二、人际关系疏离原因探究

全球范围内，目前尚无关于人际疏离和孤独感长期历史趋势的确切信息，也缺乏较近时间内的整体趋势数据。然而，我们可以透过部分迹象发现，在某些国家，如我国和美国，人际疏离或孤独感在过去几十年中更加流行。数据还显示，在大多数国家，独居人口的比例也正在逐年增加。尽管缺乏关于此议题的长期追踪数据和明确的发展趋势证据，但认为人际疏离感在过去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中一直在增加的观点普遍存在。例如，“失落的社区假说（community lost hypothesis）”认为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上升是现代性的副产品，其特征包括快速、颠覆性的技术进步、世俗化、个人主义、民主化、资本主义、大众社会、城市化及其他因素（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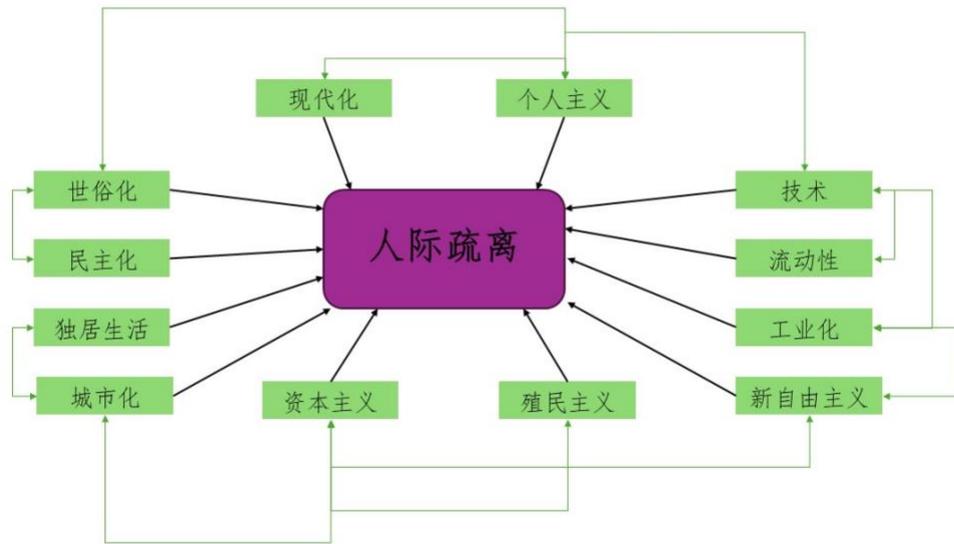


图 1 导致人际疏离的可能因素

工业化、城市化和群体性独居生活。工业革命导致了城市中心群体性独居生活的兴起。独居是反映社会联系结构维度的指标，也是人际疏离和孤独感产生的潜在风险因素。在欧洲、日本和北美部分地区，20 世纪单人家庭数量出现了剧烈增长，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因素被用来解释这一增长，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如预期寿命延长、婚姻模式改变、出生率下降、不育现象增加、离婚率上升）、经济繁荣、女性权益提升（减少年轻女性独自生活的限制）、通信技术变革、城市化、教育以及个人主义思想。工业化在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例如，我国近些年来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人们与原本的社会关系分离。到 2014 年，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工人占我国总人口的近五分

之一（2.74 亿）。有学者对我国 25 项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1995 年至 2011 年间，我国老年人孤独的患病率显著上升。

技术。数字技术出现之前，技术对社会联系与疏离的影响尚不明确。技术长期以来被视为人际疏离与孤独的成因与解药。例如，斯莱德认为，美国存在通过自动售货机、晶体管收音机、点唱机和超市等技术替代人类互动的趋势，旨在更好地实现速度、效率和成本优势。这个趋势约始于内战（1861 - 1865）后的城市化浪潮。其他学者则认为情况更为复杂：火车、飞机和汽车对社会联系的影响是混合的，既使人们能够扩大社交网络并在搬迁后维持联系，但也可能削弱人们的整体归属感。新型通信技术（如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个体与他人沟通和互动的方式。

世俗化。世俗化与宗教衰落的现象始于 19 世纪的欧洲，可能对人际疏离感的增加起到了推动作用。原本的宗教信仰往往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抵御人际疏离和孤独感。首先，宗教聚会和机构提供了一种社会联结感、归属感和社区感。其次，与超自然实体的关系，通常通过祈祷、仪式和其他实践来支持，提供了一种陪伴和团结感，确保没有人会真正感到孤独。第三，宗教信仰、实践和原则提供了意义、目的和安全感，以及对他人善意和慈善的感觉。最后，一些宗教倾向于重视传统家庭结构和纽带，这可能有助于抵御孤独感。

殖民主义与原住民。欧洲殖民帝国在 20 世纪初达到顶

峰时，覆盖了地球表面积的 84%。殖民主义的长期和代际影响可能解释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社会疏离现象。强制迁移（常伴随家园、土地及其他财产的丧失）、原住民语言的压制与传统文化的消蚀、系统性歧视与边缘化、社会经济劣势以及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的持续冲突都对人际关系维持有持续的负作用。例如，在新西兰土著人口毛利人中，年长毛利人面临的人际疏离和孤独感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丧失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殖民主义。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大规模迁移潮涌向城市中心，许多毛利人离开农村部落社区，前往大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这导致人际疏离加剧，与祖先和农村家园的联系减少。传统知识通过文化仪式传递给新一代的频率也降低了。智利原住民占人口的 9.5%，面临比其他智利人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健康挑战。这些不平等现象导致人际疏离和孤独感更高。老年原住民面临的挑战包括社会排斥、其居住的农村地区人口流失、文化延续性中断（因年轻一代迁移至城市）以及家庭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例如，在智利最大的原住民群体——马普切人中，仅 23% 的老年人表示未经历孤独感，66% 表示有孤独感，11% 表示极度孤独。

而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出发，学者则认为有三个层次（个体层面，社交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影响着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产生。从个体层面看，如下的六个因素这是导致人

际疏离产生的主要原因：(1) **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和性别，可能与人际疏离和孤独感体验相关，尽管相关证据有限且存在一定矛盾。此类特征可能通过社会经济状况（如健康和收入）、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以及主观归属感等间接机制发挥作用。(2) **教育**是抵御人际疏离和孤独感产生的因素，因为它能扩大个人的社交网络并提升财务状况。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可能因获得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机会而更好地抵御孤独感，这有助于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慢性压力，扩大社交网络并提升人际关系整体质量。(3) 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例如家庭收入或家庭财富，通常但并非总是与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相关，这种因果关联可通过影响个人参与更多社会活动的的能力来实现。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孤独感体验的定性研究系统综述发现，贫困是影响孤独感体验的反复出现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际疏离。这些因素不仅限制了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还伴随较低的社会地位，且可能影响社会互动。(4) 有部分证据表明**就业**可缓解孤独感，因为就业通常伴随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尽管远程办公的兴起可能改变这一状况，但是，综合来看，就业者的孤独感报告率始终低于失业者。(5) **身心健康状况**与社会隔离和孤独感密切相关。身体功能较差可能限制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和机会，从而加剧社会隔离。既往或慢性疾病也可能降低互动质量，导致更多孤独感体验。大量证据表明，焦虑和抑郁尤其与社

会隔离和孤独感相关，尤其在青春期和老年期。健康状况、人际疏离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双向的：健康问题是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风险因素，反之亦然。**(6) 人格特质**是孤独感出现的又一因素。神经质倾向（即更容易体验负面情绪）与更高的孤独感相关，外向性则与更低的孤独感相关。在每种情况下，这种关联都很大且部分具有遗传性。孤独感的另一潜在驱动因素可能包括个体对未来的信念，那些对生活缺乏明确目标或方向的人可能面临更高的孤独感风险。

在人际交往层面，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出现则是由这四个方面因素所导致的：**个人的关系状况**，包括婚姻或伴侣状况的变化，以及**居住安排**（如是独居还是与家人一起居住等）。

(1) 个体关系状况被认为是人际疏离和孤独感最重要的直接风险因素之一，没有伴侣的个体更容易经历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然而，关系质量同样重要，尤其对孤独感而言，仅仅处于伴侣关系中并不足够。例如，在关系中感到被束缚，如经济上的束缚，会抵消拥有伴侣的潜在保护作用。**(2) 独自生活**被发现是导致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最强风险因素之一。家庭中伴侣的存在，而非子女，可能也是导致孤独感差异的主要因素，尤其对老年人而言。此外，亲密伴侣暴力已被确认为人际疏离的风险因素，尤其在个人被故意与家人和朋友隔离的情况下。社会联系，包括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稳定、积极的关系，是抵御亲密伴侣暴力的保护因素。**(3) 孤独感**

与个人的**社交网络**密切相关，但其质量和功能而非规模更为重要。与朋友和家人保持频繁联系，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以及相互给予和接受支持，是抵御孤独感的保护因素。然而，数量与质量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生命历程而变化。个人社交网络的变化也可能成为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潜在驱动因素，例如由于亲人去世（尤其在老年阶段）以及访客减少和社交活动邀请减少所导致的变化。主动减少社交接触被识别为部分人应对孤独感的方式，然而，这在长期内会导致人际疏离加剧和孤独感进一步加重。（4）缺乏**社会活动和参与**是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风险因素，但可能具有双向性，因为孤独感也可能影响（对）社会活动和参与的渴望。增加社会支持可能是预防社会隔离和孤独感的保护因素，尽管感知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的关联往往比与社会隔离之间的关联更强。另外，现有证据表明，社会互动的数字化程度提高对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影响是复杂的，这取决于技术类型、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以及使用者身份。数字技术可能对经历边缘化的人群更具益处，例如因残疾或贫困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人群。

尽管关于社区层面风险因素的证据较少，但仍有部分研究结果能够支持我们的论述。不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可能加剧不平等现象，进而增加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风向。而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可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社会基础设施包括人们可以接触到的政策、服务、资源和公共空间，这些使

他们能够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充分参与社会、公民和经济生活。经验地看，大多数孤独感较低的社会拥有良好的公共社会基础设施。同理，也有研究发现在人均拥有更多社会基础设施的地方，居民的孤独感预测率较低。关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冲突，特别是那些以牺牲或排斥他人利益为代价满足部分人群需求的基础设施，可能通过排斥和丧失归属感间接影响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社区因素中的邻里满意度、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也与较低的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相关。

三、国际政策和经验的总结

尽管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问题日趋严重，但是截止到2024年底，仅有为数不多的8个国际卫生组织成员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积极回应和解决这一问题（见表1、表2）。这些已经颁布的法规政策条例中，大多数政策都强调孤独感存在的负面影响，而美国是唯一例外的国家，美国的相关政策中对该问题的讨论则较为正面且积极。日本是少数几个将孤独感和人际疏离均作为政策议题的东亚国家之一，这些议题在法律和国家计划及项目中被明确提及，旨在通过促进联系来预防孤独感和人际疏离。这八个国家的14份政策文件中，有7份是战略，5份是行动计划（或其他类型计划），1份是法律，1份是建议。所有国家的政策文件均强调孤独感作为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许多人认识到，解决更

广泛的社会因素可以减少孤独感和社会隔离，并促进更强大的社会联系。此外，尽管政府结构不同，所有关于社会联系、社会孤立和孤独感的国家政策文件都呼吁采取全社会参与，例如国家政府与组织、企业、机构和地方当局合作，以及不同政府部门（如教育、医疗、经济、空间规划、文化、住房、交通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协作。部分国家，如苏格兰和威尔士，明确提及希望推广的价值观以构建互联社会。荷兰的行动计划聚焦于市政层面，日本也推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倡议，如基于立法设立地方平台和委员会。丹麦是唯一一个设定具体目标的国家，即到 2040 年将孤独人群数量减半。瑞典认识到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障碍和偏见会导致孤独感，因此将孤独感视为社会问题。美国是唯一一个呼吁改革数字环境的国家。

表 1：部分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措施一览

国家	政策主要目的	政策推荐措施
美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构建联系更加紧密的生活圈和社会； 2. 呼吁关注社会和整个社区健康和福祉指标的重要性，以及缺乏社会联系的严重后果； 3. 呼吁制定国家战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加强当地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 2. 颁布有利于建立联系的公共政策； 3. 动员卫生部门； 4. 改革数字环境； 5. 深化知识； 6. 培养连接文化。
德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以跨部门方法解决孤独问题； 2. 将孤独作为一项社会挑战来应对； 3. 该战略视作德国系统性处理该问题的又一基石。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提高公众意识，减少耻辱感； 2. 增强知识，资助研究； 3. 加强社会工作者的力量； 4. 在各部门之间开展合作； 5. 推广低门槛、无障碍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

表 2 部分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措施一览（续）

国家	政策主要目的	政策推荐措施
日本 (一)	<p>1. 通过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基本原则和责任，为全国范围内解决孤独和孤立问题的努力奠定了基础。规定了以下基本原则：</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全社会共同应对孤独和寂寞问题； - 促进基于直接受影响者观点的措施； - 促进有助于个人感受到与社会的联系并体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举措。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成立以总理为首的总部，制定优先计划； 2. 加强对孤独和寂寞政策的了解，并开展宣传活动，支持不同社会成员自愿； 3. 促进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出台支持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的举措； 4. 促进对处于孤独和寂寞状态的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日本 (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 为今后的工作重点制定消除孤独感的具体措施，目标是建设如下社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一个没有人被孤独和寂寞所困扰的社会。 (2) 一个个人相互支持、相互联系的社会。 3. 注重预防孤独和寂寞。 4. 为孤独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社会和他人互动，过上顺畅的日常生活和社交生活。 	<p>根据以下四项基本政策，推广解决孤独和寂寞问题的措施：</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减少耻辱感，鼓励坦诚交流和寻求帮助； 2.为个人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和个性化咨询； 3.通过创造联系、归属和专业支持的空间来建立社区； 4.确保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跨部门合作。 <p>另外，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平台，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横向合作奠定基础。</p> <p>最后，政府正在开发一个咨询系统，通过电话和聊天机器人进行咨询，并为支持者提供培训课程（Tsunagari Supporter），介绍对抗孤独和寂寞的措施。</p>
丹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到 2040 年，将丹麦 ≥ 16 岁人口的孤独感减半（减至 4%）。 2. 将 11 至 15 岁儿童的孤独感降至与成人相同的水平。 3. 如果有数据，还将减少 11 岁以下儿童的孤独感。 4. 该战略列出了 75 项跨领域和特定领域的举措。 	<p>从 5 个生活领域解决孤独问题：1.家庭和住房；2.日托、学校和教育；3.休闲和社区；4.职业生活和就业；以及 5.健康和护理。</p> <p>五个重点领域是：1.加强知识储备；2.就孤独问题开展全国性对话；3.发现孤独并提供有效的帮助；4.在所有立法和政策中考考虑孤独问题；以及 5.加强横向合作，包括地方合作。</p>
芬兰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将现有的和新的战略与行动计划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可实施的实体，并设定时间表； 2. 利用实时指标、研究成果和预算编制工具支持决策； 3. 开展长期宣传和预防工作，以改变人们对孤独和社区的态度。 	<p>准备实用工具和材料，以加强重点领域的预防、支持和干预：1.家庭和密切网络；2.教育、教学、培训和青年活动；3.社会和保健服务及促进福祉；4.业余爱好、体育和其他俱乐部、非政府组织、教堂和教区以及 5.公共行政部门和决策者。</p>

瑞典	<p>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平等社会关系的社会。高度强调平等，因为在瑞典，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分布并不均衡。</p> <p>三个目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让所有人更容易进入社会舞台； 2. 减少社会参与的障碍； 3. 确保更少的人长期孤独。 	<p>所有目标中有三个主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开展有关孤独及其影响的教育，以增强合法性和减少耻辱感； 2. 提高认知，加强对活动的参与； 3. 共同努力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p>包括不同社会行动者，如政府、其他当局、地区、市政当局、民间社会、企业、学术界和个人，可为减少孤独感做出的贡献建议。</p>
荷兰	<p>通过确保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并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减少孤独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提高社区对孤独的认识。 2. 鼓励反对孤独的社会倡议。 3. 确保在所有市镇采取地方方法解决孤独问题，以增加市镇地方联盟的数量（目前为 260 个），并加强地方联盟，使其面向未来（提供资金）。

四、重塑健康社会的人际关系

正如上文所述，我国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人际疏离和孤独感的问题。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日趋减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的构思，以求改善这一问题。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是支持倡导、宣传活动、网络与联盟的开展与建立。倡导、公共宣传活动、网络与联盟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促进社会联系。尽管其有效性仍需要更多的验证，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被证实确实可以提高公众意识、动员支持、建立支持群体、强化政策并改变公众态度和行为。网络与联盟也有助于协调活动并倡导有效干预措施。最近一项有关全球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中，识别出近 200 个专门从事社会联结工作的组

织。研究还发现，地方、国家和全球网络仍处于发展初期。应制定明确的战略和激励措施，以促进合作并支持联盟的形成。

第二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研究制定宏观政策。政策在改善社会联系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尽管数量有限，但是我们仍发现有八个高收入国家已制定了相关政策：丹麦、德国、日本、芬兰、荷兰、瑞典、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美国（USA）。大多数政策都针对孤独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常见建议包括倡导全社会参与、加强证据基础、提高公众意识以减少污名化，以及促进跨部门合作。

第三是注重社区发展和干预。社区是社会联系的核心：人们在此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社区可为人们提供更多联系机会。一种方法是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公园、交通和社会服务。这些工作的推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问题的解决。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透过设计公共空间以促进人们聚集，确保所有人公平获取资源，并平等地参与到社区规划和决策过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善建成环境、支持社区团体以及将人们与非临床社区服务联系起来，以改善他们的健康和福祉。

第四是积极干预改善个人与社会关系。关于干预措施对人际疏离和孤独感有效性的证据正在迅速增加，大多数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个人及其社会关系。心理干预方法显示出最

大潜力，但方法的有效性则因人而异。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等对于从个人层面解决人际疏离和孤独感问题可能有所帮助，但其有效性和风险需进一步研究。

台海局势观察

免责声明

本刊刊载的台海时事信息等内容，均来源于公开网络渠道。由于信息传播时效性及网络信息更新迭代等因素，本刊虽尽力核实内容真实性与准确性，但无法对信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及后续变化承担责任，读者需自行判断并审慎参考。

因两岸在词汇表述、语言习惯及专业术语使用上存在客观差异，本刊部分内容可能出现表述不同的情况。此类差异不代表任何立场偏向，如因用语习惯引发歧义，以文章整体论述逻辑及主旨为准，敬请读者结合上下文理解。

本刊研究团队及全体编辑成员始终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有刊载内容均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任何文章及观点均不支持、不暗示违背该原则的立场。

本刊内容仅为学术研究、信息分享与观点交流，不构成任何政治、决策建议。读者因信息误差、用语误解或不当解读内容引发的争议及后果，本刊不承担法律责任。

本刊保留对本声明的最终解释权及修订权，修订内容将通过官方渠道公示。

《台海局势观察》月刊编辑部

2025年6月30日

要点速览

01 台湾举行“汉光”军事演习

7月1日,赖清德发表所谓的“团结国家十讲”之“国防篇”,强调“保家卫国”与军民合作,并批评立法机构削减军费。7月9日,为期10天9夜、历时最长的“汉光41号”实兵演习启动。演习分阶段模拟解放军攻台全过程,设定前3天为“灰色地带”骚扰,随后进行滨海防御、反登陆、城市防空与纵深抵抗等演练,并在后期进入“全面作战”阶段,包含城市巷战与游击抵抗。这次演习首次大规模结合2.2万后备军人与地方演练,强化“全民皆兵”与城市战场融合,新增“认知作战”“复合灾害”科目,覆盖从平时应对到战时全程。岛内称本次为最贴近实战的演习。同时,美方顾问团首次高调介入实兵阶段,参与现场指导与评估。

专家点评:民进党当局高度政治化操作“汉光41号”演习,借演习之机对内宣示“防卫决心”、对外争取援助资源,实质服务其“以武谋独”战略布局。赖清德多次以“三军统帅”身份亲赴现场宣讲“有准备、更安全”,强化全民“抗中保台”舆论氛围,将军演与所谓“国家团结”话语体系深度绑定,意在凝聚岛内政治支持、转移内部矛盾。台军刻意营造“贴近实战”“无剧本应变”氛围,安排媒体公开采访,集中展示美制新型装备与后备动员成效,凸显“自主防卫”能力,试图在岛内

外制造“台湾值得支持”的印象。

与此同时，美方首次大规模派员高调介入实兵阶段，不仅派出退役将领现场观摩，还对战术部署提出建议，显示台美军事勾连正从幕后走向前台。相关演练情境亦模拟美军驰援，强化“战时联动”预期，标志美台军事互动日益常态化、实质化。岛内鼓吹演习“史上最贴近实战”，实为借战争预演掩盖和平困局，意图以“备战”换“保台”，谋求“国际干预”空间。民进党将“全民皆兵”作为“拒统”防线，实为挟洋自重、将民众裹挟于军事对抗风险之中。然从力量对比、战略纵深与民心所向看，其以战谋独之图终归徒劳。大陆应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反独促统，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借演习之名行对抗之实，防范台海局势长期复杂化、危险化。

02 “台美”关税谈判进展牵动两岸局势

2025年7月，台湾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备受关注。7月初有消息称，台湾方面有望在特朗普美国总统政府的关税豁免期，7月9日前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以避免高额关税。7月2日，台湾当局副领导人萧美琴证实双方谈判“波折”，但强调正积极协商，尤其在半导体、高端制造和清洁能源领域的互补合作。7月11日，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郑丽君表示，已与美方敲定下一轮实体磋商时间，谈判取得进展，表明台湾方面正努力争取较低的关税税率。

到7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关税谈判应更加透明，因为有传闻称美国可能对台湾产品征收32%的关税，引发各界担忧。台湾与美国间的关税谈判不仅关乎贸易税率，更深层地折射出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台湾方面如何在确保经济命脉的同时，于中美两大强权间寻求战略平衡的艰难。

专家点评：美国借关税调整“印太战略伙伴关系”，旨在维系自身经济利益及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主导权，同时防范台湾方面全面“倒向”大陆。对台湾而言，半导体、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等支柱产业极度依赖美国市场，高额关税将重创其经济，迫使其寻求新的出路，并牵动其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位置。目前谈判进程曲折。台湾方面积极争取低关税，并已敲定下轮磋商，展现求取互利决意。然而，岛内中国国民党对透明度的质疑和高关税传闻，折射出台湾方面在外部压力与内部期望间的艰难平衡。

我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与灵活性。应密切关注谈判，精准评估其对两岸经济合作及台企外迁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大陆可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化与台湾的经济融合，例如通过降低部分台湾产品关税、优化贸易便利化措施等方式，展现大陆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对冲美国关税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台湾企业提供更多选择。政治上，坚持“九二共识”，

强调两岸经济互利，呼吁台湾当局以民生福祉为重。同时，警惕并揭露美方利用经济手段，试图将台湾“工具化”或“武器化”的图谋，强调任何关税壁垒都无法阻碍两岸经济的自然融合。最终，大陆应提升自身经济韧性与产业竞争力，加速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并深化 RCEP 等区域合作，为区域伙伴提供发展空间，以期在长期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

03 大陆对台实体实施出口管制

7月9日，我方商务部宣布将8家配合“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的台湾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这些实体涵盖军民用航空器、无人机、造船及防弹衣等领域，包括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纬航太科技公司、中山科学研究院、仲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龙德造船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攻卫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台湾陆委会对此事予以回应，谴责我方“将经贸措施武器化，悖离台湾主流民意，完全无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7月16日，国台办发言人陈华斌表示此举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举措，是维护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正常秩序和两岸同胞利益福祉的正义行动。此事在岛内持续引发热议，部分学者认为台湾军工相

关产业与大陆的连结本就薄弱，对台实际影响效果不大；也有研究人员提出若我方未来进一步扩大管制范围，可能将对台湾高科技产业及所谓“军事工业”的供应链造成压力。

专家点评：大陆对台湾实体实施出口管制，标志着我方对台政策工具从经济融合向“安全优先”转型。这一举措不仅是经济制裁，更是政治手段，旨在推动“反独促统”工作。我方之所以采取以上行动，一是为了反制台当局“以武拒统”行径，如发表“团结国家第四讲（国防篇）”、开展“汉光演习”及发展军事工业等；二是为了警示台当局“倚外谋独”行为，尤其是协助美国“以台制华”，对我方中芯、华为等半导体实体采取出口管制；三是为了对台湾支柱产业形成连带震慑效果，台湾半导体行业高度依赖我方稀土原料，若进一步扩大制裁会严重冲击台湾经济。

大陆对台湾实体实施出口管制会对两岸局势造成影响，首先会限制台湾军工、航天、造船及防务产业的发展，打击这些行业通过第三地“转口”获取我方配件，揭开“非红供应链”背后的“灰色供应链”，遏制台当局军事现代化进程；其次可防范稀土等关键材料经由台湾转卖至美国，精准反制美国“以台制华”策略，打击台当局“倚外谋独”气焰；再次若进一步扩大管制范围，恐会冲击台湾经济命脉，

加速区域半导体产业链重构。未来，可持续采用出口管制手段，限制台湾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同时，应警惕台湾方面推动关键原料供应链多元布局与自主研发，需及时制定应对策略。

深度观察

232 条款下“美台”半导体的博弈与台湾挑战

232 条款对半导体的限制，不仅是贸易问题，更是美中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试图重塑全球科技供应链、削弱中国影响力、并确保自身在关键技术领域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工具。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枢纽，成为这场博弈的中心，其变化局势直接关系到全球科技格局的未来。当前，“美台”半导体经贸谈判正处于密集阶段。自 2025 年 4 月以来，双方代表夜以继日地磋商，力求在 8 月 1 日前达成一项互惠协议，以规避美国可能对台湾征收的 32% 关税及潜在的半导体相关额外关税。

美国已与印尼、英国、越南等国敲定的贸易协议，台湾的处境更为严峻。为争取有利局面，台湾已承诺加大对美投资、增购美国能源并提高国防开支。全球半导体代工巨头台积电亦积极行动，仅 2025 年第二季度，台积电在美国的游说支出便高达 97 万美元，旨在影响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

案》、出口管制及各项贸易提案的政策走向，以期降低贸易壁垒。

一、“美台”半导体博弈的核心

美国《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赋予总统权力，可在商务部调查认定进口产品威胁国家安全后，采取关税或贸易限制措施。这一轮次针对半导体的232调查，其范围极其广泛，涵盖“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及其衍生产品”。这意味着从半导体基板、裸晶圆、传统芯片、前沿芯片、微电子元件、半导体制造设备组件，乃至所有包含这些组件的下游产品，均可能受到影响。美国政府将此视为“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重塑关键行业供应链，减少对外国进口依赖，尤其针对受非市场政策扭曲的进口产品。

在此次232调查中，“衍生产品”的广泛定义，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构成最具结构性的威胁。它将影响从芯片本身延伸至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等所有包含台湾芯片的下游ICT产品。即使台湾芯片先运至第三地组装，最终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仍可能因含有台湾组件而面临关税壁垒。这预示着传统通过第三地转移生产线规避贸易风险的策略将失效，表明美国的目标是重塑整个半导体价值链的控制权，而非仅限于限制芯片制造环节的进口。

二、美国寻求战略自主与产能提升

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通过 232 条款调查，减少对外国关键输入的依赖。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通过 232 条款和 301 条款调查，同期审查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国家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及产能过剩等问题。

此次调查旨在解决美国技术和国防部门在依赖外国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存在的潜在脆弱性。其核心目标是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以对抗中国在该领域的战略主导地位。

尽管美国在半导体研发、设计和工具方面仍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50.2%，但其制造份额已从 1990 年的 37% 大幅下降至 2022 年的 10%。这种制造能力的相对下降，促使美国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措施吸引私营企业投资，其目标是到 2032 年将最先进芯片的国内生产比例提高到近 30%，并将美国在全球芯片生产中的份额提升至 14% 或更高。

三、台湾的应对与挑战分析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尤其在 3 纳米和即将到来的 2 纳米等先进工艺节点上，台积电的领先地位无与伦比，对 AI 芯片、高性能计算和 5G 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台湾在光刻、晶圆设计和洁净室精度方面的规模和专业性知识，使其能够抵御短期冲击。美国和欧洲对台湾芯片

在国防电子和AI驱动监控等国家安全系统上的依赖，进一步增强了台湾的结构性韧性。

（一）台湾方面的应对策略

面对美国的 232 条款调查和潜在关税，台湾采取了多方面应对策略。第一，积极谈判争取豁免。台湾将美国的 232 调查视为“谈判工具”，而非直接威胁。预计美国为避免破坏自身科技供应链，最终可能豁免台湾的先进节点。美国总统在 2025 年 4 月 11 日发布的备忘录中，已将自动数据处理系统、平板显示模块等关键半导体产品排除在对等关税之外，为台湾企业提供了“观望”期。第二，调整供应链多元化。面对中国对镓、锗等关键矿物的出口限制，台湾通过多元化采购网络并深化与AMD、NVIDIA等美国公司的合作来缓冲冲击。第三，承诺对美投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 120 亿美元晶圆厂建设已完成 60%，这被视为确保美国政策制定者“利益攸关”的关键举措，从而降低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第四，战略重心调整。台湾正将重心从建立新的贸易和工业区转向升级现有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使其成为全球供应链协调和高价值制造中心，以保护其在研发、系统设计、先进工艺和顶尖人才方面的核心资产。

（二）台湾仍将面临的挑战

未来，台湾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第一，“衍生产品”定义带来的广泛风险。232 调查对“衍生产品”的广泛定义，使

得即使台湾芯片经第三地组装成最终产品再出口至美国，仍可能面临关税壁垒，这直接挑战了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第二，不对称关税的存在冲击。在最坏情况下，如果美国仅对台湾征收关税而豁免其他国家，将严重削弱台湾企业的竞争力，可能导致成熟制程订单逐渐转移，并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第三，长期存在不确定性。232 调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促使一些客户加速供应链多元化，从而对台湾的长期市场份额构成潜在威胁。

台湾的策略并非被动承受，而是主动利用其在先进芯片领域的“不可替代性”作为谈判筹码。通过在美投资、深化合作和积极游说，台湾试图将自身利益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需求深度绑定，从而将潜在的贸易威胁转化为战略合作机会。